高教信息

DIGEST OF HIGHER EDUCATION

第1期
（总第137期）
2016

烟台大学
YANTAI UNIVERSITY

高教信息

（季刊）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房绍坤

副主任： 宋中民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凤熙　马国清　王培进　王淑云　兰　翠

任万忠　毕可志　张　伟　张小霞　张平华

李作宏　李秉钧　杨　滨　杨欢亮　沙　涛

陈义保　孟庆义　罗玉萍　姜付义　赵文静

郝曙光　徐　阳　郭承华　隋杰礼　傅风华

主　编： 郝曙光

副主编： 刘丽娜　孙　英

高教信息（季刊）

主管单位：烟台大学
主办单位：发展规划处
编　　辑：高教研究室
主　　编：郝曙光
副 主 编：刘丽娜　孙　英
地　　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清泉路30号
邮　　编：264005
电　　话：0535-6902347
E-mail：ytugjyjs@163.com
网　　址：http://fzgh.ytu.edu.cn/gjyj
印　　刷：烟台大学印刷厂

目录

【教育基本理论】

提高教育质量……袁贵仁（4）

高水平大学建设：一种新框架和路径 …… 董云川,等（8）

【高校领导论坛】

明确定位 加强评估 深化改革 提高质量 ……陈　旭（14）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问题和对策研究 …… 李传起（16）

【高等教育管理】

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对中国高校管理的启示 …… 郭丛斌（19）

“中国模式”新型大学智库话语权的建构与发展
…… 张宏宝（25）

【教育综合改革】

建立自我评估制度 健全质量保证体系…… 黄宝印,等（29）

从主体关系看深化高校科研领域综合改革的取向
…… 刘志彪（32）

内 部 资 料　免 费 交 流

2016年第 1 期（总第137 期）

【院校研究】

加强院校研究 深化综合改革 …… 廖旭梅（36）

地方本科院校教育质量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烟台大学CCSS的调查数据分析

…… 烟台大学发展规划处、教务处（42）

【高等教育资讯】

中国教育概况

——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51）

“十二五”山东教育成就回顾（高教） ……（54）

张大良：鼓励高校在同一层次和同一类型中争创一流

……（55）

《烟台大学章程》正式核准 ……（55）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2015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

……（56）

Director Yantai University
Sponsor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Edited by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Chief Editor Hao Shuguang
Vice Chief Editor Liu Lina & Sun Ying
Address Yanta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264005, China
E-mail ytugjyjs@163.com
Website http://fzgh.ytu.edu.cn/gjyj
Printed by Printing House of Yantai University

本期执行编辑： 孙 英 日期： 2016年1月4日

封面设计：王 磊

提高教育质量

袁贵仁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我们党站在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为“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提高教育质量是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性工作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只有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的目标要求，才能确保我国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不平凡的五年。

以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引领，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提前两年实现规划目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推进，新增劳动力绝大部分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贡献力明显增强，继续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大，民族教育快速发展，残疾学生受教育权利得到较好保障。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将进入提高质量的新阶段。《建议》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所有这些发展理念的落实，都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要求，把提高教育质量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从坚持创新发展看，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教育创新为各方面创新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撑，花大气力抓好教育是创新发展的根本大计。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提高高校基础研究能力。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从坚持协调发展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通过教育加快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只有全面高质量的教育，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协调发展。从坚持绿色发展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既丰富和拓展了教育的服务领域，又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积极参与和支撑低碳循环发展，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坚持开放发展看，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化教育的基本特征。要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开放把中国教育办得更好，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对外开放战略大局。从坚持共享发展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使全体人民在教育改革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二、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多次就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出重要指示。《建议》进一步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化教育改革，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现了新时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要求，是教育系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所在，是“十三五”时期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教育工作的根本宗旨。衡量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一个地方教育办得好不好，关键看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多少高质量人才和高质量成果。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要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教育的重要方向，全面适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需求，在服务中体现教育的地位、作用和价值。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紧密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真正落实到教材课堂中，落实到文化育人中，落实到实践活动中，落实到政策制度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同民族团结教育，同提高法治意识、环境意识、国防意识等紧密结合，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强大合力。

（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工作重点

人才培养的质量，不应只看学生考试分数，更根本的是看学生是否具备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要面向全体学生，牢固树立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和系统培养观念，更加注重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更加注重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协同育人，努力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要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更加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为党和人民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三、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全力落实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根据《建议》的部署，“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要以促进公平为基本要求、以优化结构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在提高教育质量上下大力气、下苦功夫，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

（一）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现代化的教育是公平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建议》对促进教育公平的部署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坚持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保障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同样受到良好教育，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二是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学前教育，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办好特殊教育”，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三是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强化政府促进教育公平的主体责任，“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完善资助方式，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进一步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

（二）提高教育质量，必须着力优化教育结构体系

现代化的教育应当有合理的结构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建立人才培养的协调机制，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使我国教育越办越好、越办越强。《建议》将优化教育结构体系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点，作出了三个方面部署。一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集团化办学、校企一体化办学、“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推进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二是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三是全面提升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加快建立高校分类设置、分类拨款和分类评估制度，形成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的长效机制；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办好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支持高校参与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为科学民主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三）提高教育质量，必须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必须加快教育改革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建议》重点从四个方面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了部署。一是落实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二是推进教育信息化。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完善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三是完善教育督导，加强社会监督。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健全国家教育督导制度，引导社会参与监督学校管理和改革，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四是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健全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加强民办学校内部制度建设，保障民办学校、学生、教师合法权益。

四、努力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坚强保证

实现“十三五”时期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任务，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提高领导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能力，努力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一）加强和改善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完善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及时研究解决提高教育质量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健全各级各类学校党的组织，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切实维护学校和谐稳定。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二）大力提升依法治教能力

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教育质量，加快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努力把教育改革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教育部门要依法行政，健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学校要依法办学，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全面推动章程建设，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切实增强教育系统干部师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性。

（三）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提高教育质量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引导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治力度。落实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着力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成长，维护教师权益，吸引、鼓励、支持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大力宣传优秀教师先进典型，让尊师重教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我们要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袁贵仁，教育部部长。）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1月9日】

（上接第13页）运作模式，如针对“学科—企业关系项目”设立的类似“协同创新平台”就是一个能促进发展资本生产、流动和共享的组织模式；其二，建立完备的规范（如合同、组织规则等），它能够以契约的形式使松散或之前从不来往的行动者组成优势互补、共担责任和风险的联合体，促进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信用与合作，节约信息搜集、谈判签约和交易监督的费用。与此同时，它还能够增加彼此合作的频率，并从中增加异质性资源在行动者之间流动和交换的机会；其三，营造情境氛围。要以行动者的需求和心理为依据，赋予每一种关系及其行动特定的意义，并让这些意义通过话语载体（语言、文本等）传递给关系中的各行动者，从而让行动者在进入该关系空间时，体会到与他人交往活动的魅力与美好，在产生对该空间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组织支持感的同时，产生出与他人交往的强烈期待及行为。当前，最要紧的就是营造崇尚团结合作、积极有为、创新的氛围，消除论资排辈、嫉贤妒能、保守消极等落后习惯势力的影响。

（作者简介：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

高水平大学建设：一种新框架和路径

董云川　罗志敏

一、从“重点大学”到“高水平大学”

高水平大学建设关涉一所大学如何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以发展成为高水平大学的问题。无论是1993年国家教委根据《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确定的“211工程”大学，还是1998年后教育部根据《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先后确立的39所“985工程”大学，都延续了1954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圈定和确认“重点大学”的建设思路和逻辑，即国家集中有限的资源，扶持少部分高校达到“世界较高水平”或“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换句话讲，所谓高水平是将一些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参照对象进行对比，“高水平”就是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以上这种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思路和路径显然是基于政府行动，即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意志”，运用自上而下的管理策略来达到治理目的。这一过程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通过顶层设计对大学进行区别对待。如“985工程”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就是在政府主导的决策模式下，通过工程项目、规划纲要这样制度化的方式对大学进行有区别的资源配置。其二，以身份认定为杠杆。无论是早期的“重点大学”，还是后来的“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都是政府对大学的一种身份认定，即它们都是依靠行政手段制定的。正如有学者认为的，所谓的“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并不是通过学术、教学上的相互竞争、“狭路相逢勇者胜”决出来的，而是在一轮又一轮项目认定的基础上，通过“资源配置的剪刀差”形成的。

以上这种基于政府行动的高等教育治理，在国内形成了一批在办学实力方面明显优于其他高校的大学，也被认为是缩小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做的负面效应很明显，以至于目前我们采取的许多补救措施都难见成效。如对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来讲，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差序格局”，而这又使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不同大学之间的“马太效应”愈来愈明显。其最终的结果就是，那些处在高等教育系统“金字塔”顶端的大学永远无后者能迎头赶上的后顾之忧，而处在低端的地方高校则几乎没有任何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此外，它还造成地方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压制。更为负面的是，这种做法也使大学依附于政府的倾向非常鲜明，导致作为发展主体的大学缺乏办学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从而制约了大学进行自我变革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再也无望进入国家重点大学建设行列的大学（主要是地方高校）趁着国家开始重视本科教学质量，开始筹划对高校进行分类管理、分类评估之机，将建设“高水平大学”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并赋予“高水平大学”新的含义，即其比较的对象并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或特定的一类大学范围内，如许多地方高校将自身发展方向定位为“区域内的高水平大学”。这里的“高水平”就不是“世界一流”，也不是基于后发战略追赶那些“211工程”大学或“985工程”大学。那么，什么是“高水平大学”呢？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涉及国内的绝大部分高校能不能实现自我救赎以建成高水平大学的问题，也关涉它们如何建设成为高水平大学的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当前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深层次地阐释何为“高水平大学”的基础上，通过搭

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论证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具体路径。

二、高水平大学：一个值得深究的概念

作为一个时常出现的媒体话语以及学术核心概念，“高水平大学”的提出，不仅是一种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一种大学发展路径及方式的大转换。作为高水平大学建设问题研究话语体系的基石，高水平大学必定是一个绕不开的、需要继续深究的概念。

1. 高水平大学的已有解释

应该来说，“高水平大学”是一个产生于中国政治话语环境中的特有词汇，并于2000年以来被社会媒体、高教界和学界普遍沿用。但是，什么是“高水平大学”，从收集的文献来看，无论是学界和高教界，还是像《中国教育报》这样的主流社会媒体，其看法很不统一。如根据卡内基分类法和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采用的“四分法”认为，研究型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或凭借大学排行榜认为，排在前列的就是高水平大学；或是以得到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参照认为，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除了以上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之外，还有一些更具中国特色的说法，如认为中央部委所属的大学或中央管理高校（即“副部级”高校）就是高水平大学，或认为“985工程”建设高校为高水平大学，或认为设立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为高水平大学。而对于被划定为高水平大学范围内高校的水平或实力高低的比较，则以拥有多少个国家重点学科、有多少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多少名院士、有多少个博士点、获国家级科研奖多少项、年度科研经费多少等指标来衡量。

以上所列举的有关高水平大学的各种认定标准都从某一角度突出了高水平大学的某一或某些特征，体现了其在办学水平方面的成就。但是，这些认定标准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局限性，甚至有些认定标准根本就没有触及高水平大学的本质。

事实上，一所大学时常标榜的院士、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科研论文的数量，无论是社会还是学生和家长都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因为那些都是“中介性”指标或“中间产品”（服务供给的主体结构和形式），他们关注的是“最终产品”，即他们从大学得到或感受到的服务水平与质量。对此，有学者认为：“（这种）数字本身不能代表大学任何东西，它只是过去成绩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起始点，它本身不能代表一流的大学、一流的教学。学生更需要的是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学，能找到好的工作和获得较好的社会回报……”。另一方面，以上对高水平大学的认定标准都是从大学的层次、类型或人为规定的重要程度出发对大学的一种类别划分，因此具有很大的排他性。于是，按照这种标准，高水平大学在我国就成了那些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大学或“985工程”大学的又一种称呼。

那么，到底什么是高水平大学呢？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发现“高水平大学”这一概念应该有不同于诸如“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重点大学”、“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等概念的独特之处，并力图对其做出解释。但只是对其作模糊化的处理，无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如有学者认为，“所谓高水平大学，可以认为是在某一方面达到相当高度的大学……高水平大学相对于一般的大学而言可以是整体水平很高的大学，也可以是某一或某些方面的水平很高。”

以上这一解释用“水平”来解释“水平”，相当于用概念来解释概念，用尺子来度量尺子。这就难免存在一种循环解释、往复论证的问题，从而让我们无法理解什么是“高水平”，当然也无从了解什么是“高水平大学”。针对这一困惑，有学者无奈地认为：“高水平大学是依据水平高低对大学所进行的一种层次区分，它既没有精确的边界、元素与集合，也不存在绝对的隶属

关系。”

2. 高水平大学的深层阐释

那么，如何认识高水平大学呢？高水平大学可以初步理解为在某一方面达到相当高度的大学。也就是说，高水平大学是一个具有比较意义的相对概念，即在某一方面达到的高度比一般大学要高。那么问题是，这个“某一方面”到底是指哪一方面？其“高”之所在或“高”之所依又是什么呢？

本文认为，大学的“某一方面”，无论是指其重点学科的数量，还是其拥有一流师资的数量，都只能指代大学的一个部分，而不能概括出大学的全部和整体的水平。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物，大学必须履行其特定的社会职能，这一社会职能，经过高等教育界的一些标杆人物、众多的经典作家以及一些政治人物的概括，无论是“人才培养”这一根本性职能，还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三大被世界公认的基本职能，抑或是后来被添加的“文化传承”职能，都是社会基于自身长期发展需要对大学这一社会组织的一种信托或需求。对此，大学应该在体现其社会职能方面达到一定的高度。而这个“高”应该是一所大学的社会职能实现的程度比较高。换句话说，只要其社会职能得到充分体现，那么这所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高水平大学不是大学的一种类型，也不是一种办学层次，而是从大学的办学水平即其社会职能实现的程度出发来衡量一所大学。也就是说，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等诸概念不同，高水平大学至少不具有排他性，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有可以向高水平大学发展的可能性，都可以办成高水平大学。

以上对高水平大学的解释虽然指出了它与其他大学分类的区别，即它是根据大学社会职能的体现程度来作为评判标准的。但是这一解释仍然很模糊，无法说明大学社会职能体现程度强弱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为了进一步解释高水平大学的内涵，本文认为，这一判断标准可以看成是大学能否充分满足相关方的需要。需要是否满足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就是衡量大学发展与否的标准、尺度。也就是说，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高低与其能满足相关方需要的充分程度正相关。如果一所大学能充分满足相关方的需要，那么其办学职能就能得到充分体现，其办学质量就高，其必然也是高水平大学。那么，接下来就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其一，满足什么需要？对大学生来讲，其发展需要就是个体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需要，包括学业上求发展的需要、素质上求提高的需要以及人格上求完美的需要。一方面，发展需要是可持续性的，即这种需要不仅是现实的、短期的需要，更是长远的、未来的需要；另一方面，这种发展需要也是多元的，既有功利性的需要，也有价值性的需要。与此同时，这种需要不但关注结果本身的客观物理标准，还包括了主体在使用过程中的主观感知。

其二，满足谁的需要？上述满足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即使是满足社会的需要，也是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的。对大学来讲，其职能的实现过程就是满足不同主体需要的过程。大学作为一个异常复杂的、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组织，其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制度主体，他们是正式制度的代理人；另一类是生活主体，他们是以校园为主要活动空间的人。以上两类主体有着不同的活动逻辑和活动方式，但是在现实活动中，作为具体的行动者，制度主体往往也是生活主体，产生并生活于具体的习惯与校情、民情之中。

其三，以什么来满足需要？本文认为，对一所高水平大学来讲，为了满足主体的发展需要应不断生产或创造满足他们身心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这种资源既包括有形资源如师资、生源、科研设备等，也包括无形资源如社会的情感性支持、文化氛围等。大学与大学之间办学水平的高低，往往体现在大学拥有的资源在高等教育系统内存在差异。在这里，满足主体发展需要的资源已经突破了一般资源的范畴，

它不仅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化的、自然存在物，一种具有精神愉悦以及激励效应的无形的文化要素，也是某些可以借助或依赖的对象，同时还能在满足各方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源。本文将高水平大学能产生或创造的、能满足主体发展需要的资本称为“社会资本”或“发展资本”。

以上分析为我们重新审视大学尤其高水平大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那就是，判断一所大学是不是高水平大学，应看它能不能在现有基础上（在已有存量资源的基础上）生产和再生产出能满足两类主体发展需要的社会资本。

三、高水平大学建设：框架与路径

作为一个非排他性的发展指向，高水平大学需要通过其具体的实践过程即高水平大学建设才能予以实现。基于上文对“高水平大学”这一概念的分析，笔者认为，所谓高水平大学建设，就是要探讨如何生产、再生产出能充分满足有关主体发展需要的社会资本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一种以“认知－关系－结构”为核心的阐释框架，以期为这种探索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好的借鉴。

1. 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分析框架

不管是站在院校的角度（集体），还是从某一个体出发，大学的内外部关系中存在着不同的、占有一定资源的行动者。就其资源来讲，大学拥有教师、学生、校友等主体所希望占有的教育、声誉等资源，以使其自身价值得到提升和获得发展机会。而教师、学生、校友等拥有大学所希望占有的知识、财力、物力、信息和社会影响力等资源，以使其在学科、办学资金等方面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就行动者来讲，大学既包括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等有一定职务，代表某一组织利益的制度主体，也包括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教师、学生以及分散在社会不同角落的各个校友等生活主体。他们共同组成一个类似于学者林南所描述的社会网络关系结构。

基于此，高水平大学建设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维护、整合、建构这些现实的以及潜在的资源，以使其能成为满足主体发展需要的社会资本。但这种资源的维护、整合及建构则需要各个行动者来完成，那么，行动者如何才能得到动员从而生产、再生产出各方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呢？这不仅是社会资本理论需要回答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关乎高水平大学建设最核心的问题。

针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特殊性（涉及个人、组织、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以及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如涉及两类行动者），本文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包含认知、关系、结构三个维度的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分析框架。

（1）认知维度。它是指大学两类主体在内外部关系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习得或积淀下来的、对其关系状况及行动所持有的情感和态度倾向。它不仅有利于行动者形成共有的语言和愿景，还能促进行动者对群体愿景和行为的共同理解和支持，从而把分散的、自私自利的个体结合在一起，形成大家相互认可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

（2）关系维度。它是指教师、学生、行政管理者等行动相关者在大学内外部反复互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既包括大学与另一社会组织的关系，也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是通过关系发生和运行的，关系越强，既有或潜在资源就越有可能转化为社会资本。

（3）结构维度。它既是指关系联结可使用的场所和通道，也包括关系维护所需要的组织、规范、通道和情境氛围。有价值的资源都嵌入在结构中。没有组织、场所、规范以及一定的情境氛围，各方之间也就无法形成且维系所需的关系，各方所拥有的既有或潜在的资源也就无法转化为他们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就某一行动者来讲，他（她）拥有的组织、场所越多，规范越完备，所处的情境氛围越浓厚，社会资

本的流动性就越大，就越容易获得更多或更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流动的、动态的，作为大学内外部关系中的资源，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行动者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发挥其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和选择作用。

概而言之，高水平大学建设可以看成是有关主体把各种类别、状态的资源转化为能满足各方发展需要的社会资本的过程。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结果则可以看成是大学各方都能充分且能持续占有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社会资本。在以上三个维度中，认知维是其内在精神联结，认知的接近性和一致性决定其社会资本的行进方向和特点；关系维是其载体，关系的广度与强度决定资本量的空间分布及可能存量；结构维是其外在保障，结构的完备性决定社会资本能否被激活以及获得的方式、获取量的多少。三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2. 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基本路径

在高水平大学建设所需的社会资本中，一部分是先赋的（存量资源），另一部分是后致的（增量资源）。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大学如何在已有存量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建设路径，动员行动相关者，将现存或潜藏在大学内外部资源转化为满足各方发展需要的社会资本。

（1）认知维层面。在认知维层面，大学在治理过程中，应引导行动者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影响和改变其潜在的价值观念，形成开放的心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愿景以及更高层次的信用，从而形成行动者认同的共同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对此，大学应为行动者各方创造持续性沟通的机会。

其一，通过持续性沟通促使行动者形成共同语言。如 Kogut 和 Zander 两位学者在研究企业间合作问题时就认为，企业作为致力于知识创造与交流的社会团体来对外开展活动，既需要关于成员动机和对外合作选择的明确说明，也需要成员与外部单位和个人之间存在（共同）社会知识基础和对共同知识的理解。这种论点也适合大学这一组织，即大学需要为行动相关者创造沟通的机会，从而在互动中形成彼此都能理解的共同语言。

其二，通过持续性沟通促使行动者形成共同愿景。在大学的内外部关系中，各行动者之间往往具有彼此相区别的语言，这些相互区别的语言或编码经常会阻碍大学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造成大学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隔阂，诱导行动者只关注本部门的利益，从而抑制资源共享。所以，当资源在这些部门之间共享时，就需要存在一系列超越部门利益和部门观点的共同愿景，这些共同愿景能够作为一种机制来促使行动者尽最大努力把行动语言及方式转化为彼此可以理解的形式。

此外，通过持续性的沟通，还可使行动者形成开放的心态，并形成相互的义务与信用关系。就后者来讲，行动者之间的义务与信用关系可以促进彼此的长期交往和紧密联系，缓解对彼此合作中机会主义行事的担心。

（2）关系维层面。大学本身是各种关系的结合体，即关系网络。大学正是通过关系网络谋求社会资本（如各种物质、信息、情感等支持）。在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关系与资源密不可分。建立各种关系的过程既是获取新资源的过程，也是对已有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大学需要从内外部关系网络中不断寻求自身发展需要的有价值资源，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自身能够利用的资源。

其一，以学科为“结点”建立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大学的内外部关系常常因“学科”结缘，因“学科”往来，因“学科”获利，因“学科”发展。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学科是大学各种资源的聚合体，因而其聚集资源的成分决定了学科的地位和水平，其聚集资源的规模决定了学科的范围和边界，其聚集资源的稳定性决定了学科的稳定性，其聚集资源的结构决定了学科的发展，其聚集资源的质量决定了学科的质量。这样看来，优秀的学科常常具备学术资源的各种要素，薄弱的学科常常缺乏一些

学术资源要素。为此，大学应以学科为“结点”在行动者之间建立关系。

其二，建立各种类别的关系项目。对立志于成为高水平大学的高校来讲，应围绕学科这个基本结点在大学的内外部，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以“合作项目”为基本形式建立各种关系，即关系项目。如果说关系是发展资本实现的载体，那么关系项目则是关系形成及维持的纽带。若站在院校这一组织层面，关系可以从横和纵两个层面进行分类：从纵的层面来讲，是指学校与上级管理机构、政府部门以及下属部门所形成的各种关系。从横的层面来讲，是指学校与其他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媒体、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的联系。这种横向关系网络越宽广，其获取资源的可选择性和资源量就越大。

但凡高水平大学都应有种类丰富的关系项目。这些关系项目为发展资本的生产提供了多样的载体，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发展需要。对大学来讲，凭借自身拥有的课程、科研等资源在关系项目的推进中，不仅使教师获得了科研经费、取得了科研成果，还使学生得到了实践、实习机会，能力得到了提升；对企业来讲，凭借自身在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革方面拥有的资源，解决了生产技术难题，培养了研发人才，从而为企业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对大学和企业双方来讲，这种关系项目则突破了传统的大学传授知识、企业实践培训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一方面倒逼大学建立更为灵活的学制安排和考核评价机制，使培养对象（大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职业发展预见性；另一方面也使企业成为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实施人才培养过程、考核评价人才培养成果、验收人才培养成效的真正主体，从而更好地实现大学教育与企业发展、学历教育与在职培训的有机结合。

（3）结构维层面。在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结构是社会资本生产的外在保障，是指关系连接以及维护所要使用的组织、场所、规范、通道以及情境氛围。离开了一定的结构，社会资本也就无从谈起。

其一，提供以供行动者交往的场所。目前，由于我国大学被认为是一个承载教学与科研的场所，大学偏重于对学生和教师的管理、管制，学生和教师的学习与生活大多都遵循着“三点一线”的规律，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被梳理得清清楚楚甚至相互独立。这种明确的功能划分虽能提高效率，但忽略了各种活动之间的过渡和融合，不利于人群的交往，信息等资源的流动也受到了阻碍。为此，提供充分的、网络化的场所，以诱发多样化的诸如自由交流等交往活动，以促进发展资本流动并使有关主体获得相应的发展资本。与此同时，这种场所的建立不仅着眼于校内还要放眼于校外。

其二，建立能便捷到达交往场所的多种联结通道。在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既需要信息等资源顺畅地传播，也需要各行动者自由地流动。对此，大学应为资源以及人员的顺畅、自由流动建立各种联结通道。如在校内，就要打破人事流动的壁垒，解除学科限制、系别限制、学院限制，以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实现学科、专业、院系之间的学术协同发展效应；在校外，就要以行动相关者（如教师、学生、校友）为中心，综合利用网络、报刊、电视等社会媒体建立信息沟通的渠道，一方面可以扩大和增强大学学科文化辐射的范围和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加强主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但要使以上这种场所和通道能够真正发挥效用，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建立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关系的组织。大学除了应有的维持型组织（如教学、科研、人事管理机构）之外，还应为各种关系的形成及维护建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同时也要鼓励校内人员以某种方式加入或参与校外的有关组织。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跨单位、跨学科、跨地域的协调性组织，以积极协调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的关系，化解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组织可以根据行动者的需求以及不同关系项目的性质和特征，采取不同的组织（下转第 7 页）

明确定位 加强评估 深化改革 提高质量

陈旭

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承担着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输送生力军和后备力量的时代重任。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核心目标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国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清华大学主要从人才培养定位、学科国际评估和教育教学改革三个方面开展了有关工作。

一、人才培养质量观与研究生教育定位

我国高等教育正经历着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奔向普及化的过程。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是规模扩张，包括招生规模扩大、院校及培养层次升格、学科总量扩展、学位点增加。在外延扩张的情况下，高校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解决好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研究生教育在这方面的矛盾更加尖锐。

研究生教育质量，主要在于教师队伍水平和学生学习发展成效，它不仅表现为在学期间的培养质量，还表现为工作之后的发展质量；不仅表现为个体质量，同时还表现为群体的结构性质量。

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前提在于明晰培养定位，基础在于搞好学科建设。前者回答“培养什么样的研究生”，后者回答“怎样培养这样的研究生”。这两个问题，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问题。因此，明晰培养定位和搞好学科建设，是研究生教育工作的主要抓手。

近年来，特别是经过最近一年全校第 24 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深入研讨，清华大学有了更为明晰的人才培养定位和教育教学改革思路，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大力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创新思维、宽厚基础、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拔尖创新人才。具体到研究生教育来说，就是要推进结构调整，完善分类培养机制，形成学术型人才与专业型人才培养并重的格局。博士研究生教育着重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具有职业素养、创业精神的高层次专门人才。通俗地说，就是使“学术的更学术，专业的更专业”。

二、学科国际评估与学科结构性质量

研究生教育的结构性质量受制于学科布局。这种布局既有学科间的，也有学科内的，具体体现为教师结构、研究方向结构和学生结构。学科布局不合理将导致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结构性落后，既跟不上学术发展步伐，也满足不了国家和社会需要。结构性质量问题，对处于经济社会重大转型时期的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显得尤为突出。

为切实把握我校学科布局及其在国际高等教育坐标中的位置，进一步搞好学科建设，清华决定开展学科国际评估。我们邀请国际同行，借助外部力量对现有学科进行诊断式评估。评估既着眼于师资队伍水平和学生个体培养质量，又着眼于全校学科的整体布局、

学科结构和学科相互间的关系是否合理，以发现学科之间和学科内部教师队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同时提出改进方案。

我们对学科国际评估进行了周密设计，通过评估过程深入了解社会、国家、世界发展的需求，从而把握学科发展长远方向。我们把是否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和是否处在国际前沿分别作为横纵坐标，希望各个学科都进入第一象限，既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又面向国际学术前沿，而不是在第三象限，两者都不靠。

从目前已完成评估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等15个学科（涉及25个院系、26个一级学科）来看，国际评估帮助我们很好地把握了这些学科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的情况，也进一步掌握了学科总体布局和各学科内部结构，更清晰地看到了各学科所处位置，更明确了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国际评估以科学的组织方式、评估过程和令人信服的评估建议，促进了共识，为学科布局和结构调整做好了铺垫，为后续深化人事制度和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支撑，增加了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最优秀的学生留下来读博，增强了自信。

三、全面深化改革与研究生教育改革

当前，我校正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先行先试。学校提出以开放带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总体思路，强化学术导向和国家战略导向，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封闭的发展模式。最近，我校制定实施《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做出了部署。

第一，改革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建立适应培养目标的录取机制。博士生招生加强对学术志趣的考察；推行“申请入学－学科博士招生委员会全面考核决定录取”的方式；推出可辅助导师选才的学术人才素质指南。专业学位硕士生招生强调被录取者与项目的精准契合，充分听取社会和市场声音，按照项目实行差异化招生，提高招生选才的科学化水平。

第二，推进研究生分类培养，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区分鲜明、各成体系。博士生教育更加突出学术志趣和创新动力，培养目标反映社会需求并体现学科发展需要，培养过程重在加强基础理论、拓宽跨学科知识和国际视野、提升创新能力，鼓励博士生跨学科交叉选题，面向学术前沿开展原创性研究，毕业后到主流的学术机构就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更加面向市场，培养目标和方案的制订将吸纳行业专家参与，制定相应的学位标准，建立以职业胜任力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第三，发展特色研究生项目，探索新的培养模式。建设一批满足社会需求的高水平特色学位项目。推动设立多学科交叉融合硕士生项目，如大数据硕士、互联网金融硕士、统计二学位/双硕士学位等项目。选择优势合作伙伴，优化国际双硕士学位、全英文硕士学位项目，如苏世民学者、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清华－霍普金斯全球政治与经济双硕士学位、清华－耶鲁环境双硕士学位等项目。面向国家战略和人类重大问题，推进发展中国家研究等跨学科博士生项目。

总之，提高质量、内涵发展，要求我们明晰培养定位，搞好学科建设，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和结构，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使教育理念、模式、方法更能适应世界、国家、学生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需要。这样，研究生教育质量就有可能持续得到提高。

（作者简介：陈旭，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博士，教授。）

【摘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年第1期】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问题和对策研究

李传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改革举措，为我国下一阶段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推动高等院校内涵式发展，不仅符合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历史演变的必然选择，也是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需要。

一、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瓶颈的基本认识

我国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改革几乎是与全国改革开放同步开始的。三十八年过去了，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重大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然而，自恢复高考以来，高等学校内部和外部管理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更没有太多的创新和创举。在世纪之交，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大，迅速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模式向大众化教育模式的转变。时至今日，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遥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完成了量的扩张，但没有质的飞跃。“211 工程”、“985 工程”、“2011 计划”等高校综合能力提升计划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提升我国部分高校的办学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上、在招生录取政策上、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上仍乏善可陈，没有起到可供全国高校学习和借鉴的示范作用。时至今日，我国高等学校数量、高校在校生规模均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在世界一流高校中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创新人才、创业人才的培养都远未达到社会的期望，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考定终身”的招考政策，重新审视高校的“行政化”内外管理，重新审视高校“大而全”的学科专业建设目标，重新审视高等院校“趋同化”的功能定位，重新审视我们的“标准化”高校评价系统，加快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章程建设，加快推进适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录取制度建设，加快推进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高校内外管理体制建设，加快推进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特色鲜明的发展定位规划，加快推进着眼于育人过程和育人效果的高校评价系统建设，力争到本世纪中叶，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地位与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相适应。

二、建设具有鲜明特色、功能协调的高等教育系统

近二十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活跃的现象莫过于高校更名，更名风一直长盛不衰。不管什么类型的学校，只要一有机会，都削尖脑袋往“大学”里扎堆。“大学”的地位高于“学院”几乎成为我国民众和高等教育界的共识。校名中纷纷取缔有多年积累的学科专业属性，地域名称加上大学字样便形成学校标识。既然叫做大学，就得扩大专业覆盖面，于是，千篇一律地追求“大而全”的学科专业结构，形成“趋同化”办学模式。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高等院校改头换面，未知其前世今生，更不知其术业专攻。

前苏联时期，高等教育系统中，各高等院校有明确的分工、准确的定位，加上崇尚学术

的精神，培养出了大批高水平建设人才，诞生了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和国际学术权威。同样，几百万人口的以色列能成为世界高科技强国，它的七所世界一流大学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德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则得益于“双元制”职业技术教育取得了极大成功。

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我国高等院校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各类高校准确定位、办出特色是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要素。我国高等学校要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就要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进行分类指导、分层建设。高等学校要根据自身的办学实力和条件，或是瞄准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或是结合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找出适合自身、切实可行的目标定位、特色定位、层次定位，特别是各自的术业专攻方向。对高等学校布局、高校办学定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做出统一的宏观调控和顶层设计，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逐步建立起“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功能协调、层次互补”的高等教育系统：部分研究型高校争创一流，其他高校则在各自的办学层次上、各自的术业领域内特色发展，以实现《决定》中提出的“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的目标。

三、建设适应创新创业教育的分类招生录取制度

迄今为止，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已经三十八年了。通过高考，国家选拔了数千万计的高层次建设人才。但是，社会在进步，一成不变的高考模式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弊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之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再一次强调“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众所周知，高校招生考试应该是科学客观的能力测试，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普林斯顿考试中心的GRE考试。可以组织专门机构，建设语言测试、数学测试、逻辑测试的大容量题库，随机抽取考题，组成考卷。为减轻中学生学业负担，可以考虑首先建立语言和数学题库，每年举行两次以上的语言和数学能力测试，条件成熟时，可以实行机考，学生可以随时参加考试，并可以多次参加考试。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诞生了一大批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担负着培养一线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任。但是，在当前的高考范式中，大多数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只能在普通高考低端成绩上被动接受考生。生源渠道的不畅，选拔方式与培养过程的不相适应，录取成绩与培养目标的明显反差，使得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总体上远远达不到应该得到的水平。因此，《决定》指出的“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十分重要。实行与普通高考相平行的“技术高考”（即高职院校入学考试）是提高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高职院校生源基础、引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有了技术高考，大量职高和中职学生就有了信心和希望，大批高等职业院校就有了合适的生源和目标，我国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就有了制度保障。

此外，强化应用导向是技术高考范式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借鉴实施多年的艺术高考的考试经验，“技术高考”采用“书面考试＋技能测试”的方式进行。“技术高考”的书面考试科目可以设定为四门：语文、数学、综合课以及选考一门专项应用技术课。其中，语文、数学的命题应针对中职职高学生的特点，有别于普通高考的要求，主要考察基本表达能力和计算能力，而不是赏析和推理能力，需要出台专门针对“技术高考”的语文数学教学大纲，以指导中职和职高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这样，中职和职高的语文教学就会以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导向，区别于普通中学。应用技术课可以参

照目前的技术大类分别设定，让学生自行选择。这里会出现不同大类之间的考试成绩可比性问题，可以采用统一的转换函数进行转换，使不同大类的考试分数转换到统一单位系统，这样，技术高考就可以实现统一划线。其中，技能测试可根据学生选报的技术大类，采用与当前艺术高考专业考试相同的方式进行，安排在书面考试之前。若发现有某种技术特长的学生，可以专门安排面试，单独录取。

有了普通高考和技术高考这两条平行的通道，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就能选拔到各自的合适生源，特别是大批中职、职高的学生就有了信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一线技能型人才培养就有了保障，更好地凸现教育为经济社会服务的功能。

四、建立适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高校治理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机构”。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管理的讨论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已逐步达成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大学管理基本框架。近年来，我国教育部正在推动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这是高校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抓手。要建立适应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高校管理模式，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逐步完善高等学校章程建设，通过章程明确议事规则和程序，规范决策行为，提高办事效率和办学水平。第二，要淡化和逐步取消管理部门行政级别，推动核心管理部门负责人的职业化，倡导“协调＋服务”的管理意识，优化管理职能，提高管理效率；扩大各二级学院用人自主权、管理自主权和资源配置自主权。第三，要开展以目标为导向的管理绩效考核，以管理效率、管理业绩为主要目标，建立、完善并实施以贡献为主要依据的资源分配机制和面向结果的问效机制。第四，要改进学生工作的方法，相关部门要以“关注学生一生发展”为宗旨，以“能力导向、深造导向、就业导向”为目标，推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第五，大学校长要成为高级管理专家。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校长罗德里克说：“大学校长的工作职责主要有三项：一是吸引最好的学生到学校读书；二是吸引最好的教职员工到学校工作；三是为教职工提供足够的资源，营造积极的氛围。”大学校长是学校管理工作的轴心，尽管校长一般是在教授中产生，但一旦走上校长岗位，工作重心应迅速从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为主转移到罗德里克所说的三件事上来，以期带动和引领全校共同发展。某些地区用大学校级领导的位子来吸引高端学术人才，乃背本而趋末，会给高端专家的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工作带来双重不利影响，足不可取。

五、建立着眼于育人过程和育人效果的高等学校评价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从世界范围看，大学评价成为各国改革高等教育的政策工具和维持高等教育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高校种类繁多、层次复杂。开展高等学校评价工作十分必要。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均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因此，思想性、实践性、创新性应该是现代大学水平的核心要素，也是大学评价系统的主要内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各类“标准化”评价系统中，优良的办学条件、高职称的师资队伍，高级别的教学科研平台，高层次的教学科研项目几乎占据大学评价的大部分指标。殊不知，尽管条件、平台、队伍、项目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必备前提，但这些前提条件和人才培养质量之间没有直接的正比关系。“标准化”评价把投入当成产出，把任务当成成果，把条件当成结论。导致

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对中国高校管理的启示

郭丛斌

自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开始对美国大学进行排名以来，世界各国不同的大学排名体系逐渐兴起，并且受到全球高校、舆论和社会大众愈来愈密切的关注。各种大学排名虽然在具体方法和指标上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都是先加工、处理各大学的可比信息，再以简单直观的结果分析、反映各高校的办学质量和影响力，并依据总体及分项得分进行排名。由于具备直观性、客观性和相对科学性等特点，大学排名逐步成为世界大学评价的重要形式与主要手段之一。几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学排名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每年排名榜单的发布都会成为各国舆论的焦点。

一、有代表性的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介绍

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前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学排名体系有4个，即《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THE）世界大学排名、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全球最佳大学排名。下面，将分别对这4个排名体系进行简要介绍。

（一）《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原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是英国出版的一份高等教育报刊，曾经是英国著名报刊《泰晤士报》的一部分，于1971年从《泰晤士报》独立出来。从2004年起，《泰晤士高等教育》与QS公司合作发布世界大

学校致力于教学科研项目的申报、教学科研平台的争取。一旦得到，就在评价中加重了砝码，而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条件的使用效益却无从考察。这种办法使得评价之前各高校三六九等就基本固化。而那些创新精神强、产出投入比高的新型学校却得不到它应有的位置。因此，我们的大学评价系统必须应着眼于发展，着眼于未来，针对不同类型的高校，设定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考虑的是大学的育人过程和育人效果，即从学校的课程品牌、学风建设和毕业生质量三个方面设计评价指标：课程品牌包括课堂教学、实践实训、研究项目以及学生满意度等指标；学风建设从学生创新成果、深造比例、学习氛围等方面进行考察；毕业生质量则从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率以及毕业生自身获得的社会认可程度（待遇和声誉）方面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让高校评价结果客观反映高等学校的育人效果，起到推动高等学校内涵发展的作用。

高等教育是培养和产出各类人才的主要基地。我们非常有必要在高校功能、招录制度、内部管理、评价体系等方面实施综合改革，切实提高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度、学生和社会的满意度、各种投入和条件保障的有效度。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成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撑的主要渠道，成为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和创新体系建设最基本的保障。

（作者简介：李传起，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光纤通信、高等教育管理等研究。）

【摘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

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逐步受到全球关注。2010 年，THE 和 QS 公司对“同行评价”和“论文引用”两项指标的使用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泰晤士高等教育》转而与汤森路透集团合作，发布新的 THE 世界大学排名，其指标体系如下（见表 1）。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包括教育教学环境、科学研究能力、引文影响力、产业收入和国际化 5 个一级指标及 13 个二级指标。2011 年后，为了避免指标体系的变化导致学校排名发生异动，影响对学校真实表现的评价，THE 的各项指标和权重未发生过变化。

在 2014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前 20 名的大学全部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 15 所、英国 3 所、瑞士 1 所、加拿大 1 所。欧美高校表现出了不可撼动的优

表 1　2014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5 个）	二级指标（13 个）	权重
教育教学环境（30%）	教学声誉调查	15%
	生师比	4.5%
	受资助的博士生比例	6%
	师均机构收入	2.25%
	博士 / 学士学位授予比	2.25%
科学研究能力（30%）	研究声誉调查	18%
	人均科研经费	6%
	人均论文发表数	6%
引文影响力（30%）	引文影响力（标准化处理）	30%
产业收入（2.5%）	师均商业机构研究经费	2.5%
国际化（7.5%）	国际学生 / 国内学生	2.5%
	国际教师 / 国内教师	2.5%
	国际合作论文比例	2.5%

势地位，不仅成批量地占据榜单前列，而且越是名次靠前，英美高校所占的比例就越高。相比之下，亚洲高校进入前 100 名的不多，进入前 30 名的仅有东京大学（23 名）和新加坡国立大学（25 名）。

从中国部分高校近几年来在 THE 世界大学排名中的表现（见表 2），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顶尖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在 THE 世界大学排名中大致处于 30-50 名的水平区间，近几年虽有小幅波动，但没有显著进步。中国的其他一流高校大部分长期在 200-350 名之间徘徊，没有明显的突破。2014 年中国大陆共有 11 所高校进入前 400 名。中国高校中排名最靠前的香港大学居第 43 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列第 48、49 名。总体上来说，中国高校在本排名中的地位还不理想，与欧美高校的差距还十分巨大。

（二）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世界大学排名

2010 年，QS 公司与《泰晤士高等教育》分道扬镳，开始独立发布世界大学排名（以下简称 QS 排名）。QS 排名的指标体系包括学术声誉（40%）、雇主评价（10%）、教师 / 学生比例（20%）、师均引用率（20%）、国际学生比例（5%）、国际教师比例（5%）等一级指标。相较于 THE 排名，QS 排名的指标体系呈现出重视主观评价（占比 50%）和重视师生比（占比 20%）的特点。在评价教学水平时，除了声誉（教学科研合一）指标，QS 排名主要侧重师生比这一指标，权重达 20%。QS 认为“师生比是衡量教学质量误差最小的指标”，而 THE 认为“师生比只能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简单指标，数量不能完全反映质量”。评判科研水平时，THE 排名指标比较多元，涉及声誉、经费、论文数量、引用次数等多个角度 ;QS 排名除了声誉（教学科研合一）指标，主要侧重师均引用率这一指标，权重达 20%。

在 QS 最新发布的 2014 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前 20 名的大学与去年没有变化，只是名次略有调整。这些大学全部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 11 所、英国 6 所、瑞士 2 所、加拿大 1 所。

表 2　中国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 400 名的部分高校

大学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香港大学	21	34	35	43	43
北京大学	37	49	46	45	48
清华大学	58	71	52	50	49
香港科技大学	41	62	65	57	51
香港中文大学	--	151	124	109	129
台湾大学	115	154	134	142	155
复旦大学	--	226-250	201-225	201-225	193
中国科技大学	49	192	201-225	201-225	201-225
南京大学	120	251-275	251-275	251-275	251-275
上海交通大学	--	301-350	276-300	301-350	276-300

注：“—”表示未进入前 400 名。

表 3　中国进入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200 名的高校

大学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香港大学	22	23	26	28
香港科技大学	40	33	34	40
香港中文大学	37	40	39	46
清华大学	47	48	48	47
北京大学	46	44	46	57
复旦大学	91	90	88	71
台湾大学	87	80	82	76
上海交通大学	124	125	123	104
香港城市大学	110	95	104	108
浙江大学	191	170	165	144
中国科技大学	188	186	174	147
南京大学	186	168	175	162
香港理工大学	177	159	161	162
台湾清华大学	--	192	199	167

QS 排名呈现出与 THE 排名同样的现象，那就是美国和英国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占全球前 30 名中的绝大多数。

从表 3 可以看出，除了排名最靠前的香港大学与 THE 排名中的名次相比高出不少以外，中国其他高校的表现与 THE 排名中相差不大。在 2014 年 QS 排名中，中国共有 14 所（大陆 7 所）大学进入全球前 200 名，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等 4 所高校进入前 50 强，分别位列第 28 名、第 40 名、第 46 名、第 47 名。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位列 57 名和 71 名。从排名可以看出，中国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三）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 ARWU）于 2003 年 6 月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前身为高等教育研究所）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首次发布，随后每年更新。ARWU 使用 6 项客观指标对世界大学进行排名，具体包括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高被引科学家数、在《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以及师均表现。每年被排名的大学有 1200 所，ARWU 每年发布全球前 500 名大学。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包括世界综合性排名及学科排名榜单，后来添加了独立的两岸四地大学排名等地区性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因采用的客观数值准则及透明度高而获得学者赞赏，但也因重理工、轻人文而受到批评。目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与 THE 世界大学排名及 QS 世界大学排名被公认为是世界三大全球性大学排名。

在 2014 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美英大学的优势仍然非常明显，哈佛大学连续 12 年蝉联全球第一，前 10 名被美英高校包揽。亚洲大学中表现最好的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分列第 21 名和第 26 名。中国大陆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列世界 500 强的仅有 32 所，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 所学校进入世界前 200 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首次跻身世界前 150 名。

（四）《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全球最佳大学排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发布的全美大学排名一直在全世界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球最佳大学排名虽然在 2014 年首次发布，起步较晚，但凭借 US News & World Report 的公信力取得了广泛的关注。有理由相信，US News & World Report 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将与 QS 世界大学排名、THE 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等当下著名大学排名同样具有影响力。

US News & World Report 排名体系包括全球研究声誉、区域研究声誉、学术文章发表、标准化引用影响力、总论文引用次数、高被引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比例、国际论文合作、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师均博士学位授予数量等 10 个指标，具体权重如表 4 所示。

表 4　2015 年 US News 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指标体系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全球研究声誉	12.5%	区域研究声誉	12.5%
学术文章发表	12.5%	标准化引用影响力	10%
总论文引用次数	10%	高被引论文数量	12.5%
高被引论文比例	10%	国际论文合作	10%
博士学位授予数量	5%	师均博士学位授予数量	5%

在 US News & World Report 全球最佳大学排名 500 强中，中国大陆共有 27 所大学进入榜单。包含香港、台湾地区在内，中国共有 11 所大学进入前 200 名（见表 5）。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和清华大学进入前 100 名，其中居中国大学榜首的北京大学位列第 39 名，香港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列第 42 和第 67 名。

表 5　进入 2014 年 US News & World Report 排名前 200 名的中国大学

大学	2014 年
北京大学	39
香港大学	42
清华大学	67
台湾大学	105
复旦大学	108
香港中文大学	118
浙江大学	128
香港科技大学	12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3
上海交通大学	148

在这个排名中，英美国家再次显现出压倒性优势，名列全球前 20 名的大学全部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地区排名最靠前的是东京大学（第 24 名），第二是北京大学。中国大陆大学在排名中的表现总体上与前三个排名中的差距不大。除了北京大学的表现比较抢眼，超越香港大学进入前 40 名，中国其他一流高校的排名普遍与其他排名变化不大，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第一批“985”工程高校都处于 100-150 名之间的位置。总体上看，中国高校与欧美高校还存在巨大差距。

二、大学排名体系的基本特点

虽然上述 4 个排名体系的评价指标、排名方式各不相同，但也存在如下四个共同特点。

*其一，高度重视学校科研水平。*大学的科学研究能力是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指标之一，集中体现了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四个排名体系中，学校科研水平的分值都占了很大的权重。例如，在 THE 世界大学排名中，人均论文发表数、引文影响力、科研声誉调查、人均科研经费等与科研水平直接相关的指标权重总计达到 60% 以上，而在 US News & World Report 排名中几乎所有的指标都与学校的科研能力直接相关。

*其二，高水平论文对排名有重大影响。*高水平论文的产出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客观地反映一所学校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而且数据公开、透明、易得。高水平论文在四个排名体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高水平论文有关的指标包括论文的发表数量、师均发表量、被引用次数、引文影响力等。与高水平论文相关的指标所占权重在 THE 排名中为 38.5%，在 QS 排名中为 20%，在 A R WU 排名中为 60%，在 US News & World Report 排名中为 65%。

*其三，突出理工科优势，对人文社科评价不全面。*从排名指标所体现的多元性、包容性来看，总体上，THE 排名的指标体系更多元，QS 和 US News & World Report 排名次之，ARWU 排名的指标体系相对简单。由于指标设置的原因，A R WU 排名无法将人文学科领域纳入考量（其解释是“很难找到合理的并且国际可比的指标”），因而这一排名对理工类大学更加有利。ARWU 把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作为重要指标，这一做法对年轻大学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较为不利，因此中国高校在该排名中长期位于靠后的位置。由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外文论文产出相对较少，加之不同文化间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标准的差异巨大，中国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实力无法充分地在大学排名体系中得以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高校排名的提升。

*其四，广泛使用第三方数据进行评价。*大学排名广泛利用第三方的评价及数据对大学的

表现进行分析，如本文的四个排名体系都很重视的学校声誉得分就基于社会公众的调查数据。

三、对中国高校管理的启示

在本文所述的四项大学排名中，中国高校的排名近年来大都稳步提升，一些高校在某些排名、某些领域中还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这是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高等教育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在各个排名中，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尤其是在国际化水平、科研水平方面差距较大。鉴于此，本文建议中国高校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水平。

其一，高度重视对大学排名的研究。中国高校应当高度重视分析和研究世界上几个影响力较大的大学排名，研究各个排名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结合自身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改善管理体制机制，提高学校管理工作水平，提高办学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进而促进学校排名的提高。同时，高校要主动与《泰晤士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以及汤森路透等大学排名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使排名机构加深对学校的认识、了解，并客观评价中国高校。

其二，继续加大高校对外宣传力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每年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在影响力较大的国际媒体，宣传介绍学校的基本情况、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等。在历年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刊物中，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等多所国际名校的校长都曾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发表过封面文章。2013 年 10 月，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代表中国大学，首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发表题为《May you lead in interesting times》的封面文章。这是中国大学校长在国际媒体上宣传中国高校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高校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因此，中国高校必须在国际知名媒体上进一步加大对最新科研进展和重大科研成果的多语种宣传力度，介绍在改善教学科研环境方面的措施和成绩，宣传中国高校在促进世界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思想创新、社会发展中做出的卓越贡献，提升中国高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整体声誉。

其三，加快完善科学研究激励机制。中国高校要想提高国际影响力，早日步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必须不断提高科研产出的数量和水平，尤其要打破壁垒，扩大技术型教师的引进力度，扩大学校人事自主权，重视高水平论文的产出。当前，许多中国高校缺少激励教师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国际合作发表论文的机制和有效措施。因此，中国高校要在重视论文数量的同时更加重视论文的质量；要不断改进科研经费的使用模式，进一步提高经费使用效益；要针对不同学科划定科研成果和论文的等级范围，设立优秀科研成果和论文的奖励基金，鼓励教师多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科研成果。

其四，不断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中国高校要高度重视和努力探索学术成果，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国际化交流与传播途径，让国外学术界在认可中国高校理工类研究实力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中国学者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强大实力。这将有助于提高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对我国高校高水平论文相关指标的贡献，有助于提升中国高校在全世界的学术声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具体来说，中国高校要进一步提升与国 (境) 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鼓励教师开阔眼界、加强和国 (境) 外教师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国际科研合作和交流；要充分发挥知名学者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影响力，鼓励各院系承办或协办高端国际论坛和会议，积极融入国际科研协同创新潮流当中。

（作者简介：郭丛斌，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

“中国模式”新型大学智库话语权的建构与发展

张宏宝

影响力或话语权是大学智库存在的核心价值。改革开放30余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智库为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公共政策走向及制定提供了智力支撑，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成就了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在“中国模式”崛起的新的发展时期，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学智库改革和发展的初始逻辑是什么？国家治理转型与大学智库发展有何关联？大学智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又在哪里？这些问题已成为建设新型大学智库必须回答的逻辑问题。

一、“中国模式”新型大学智库话语权的逻辑演变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语境下，大学智库话语权的建构与国家治理体系密切关联，国家治理体系直接影响国家的决策咨询体系，而决策咨询体系又决定着大学智库话语权获取的逻辑思维和模式。大学智库话语权的建构和发展离不开政治和经济土壤，受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从历史、现实和发展三个维度观察，中国大学智库话语权的建构和发展存在不同形态的逻辑轨迹。

1. 个体精英影响决策话语体系的历史逻辑。大学智库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即具备与其相似功能的“智囊”组织。中国古代决策咨询制度强调君王和核心决策者的搭配，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古代统治者的“食客”“军师”“师爷”“谋士”“谏议大夫”等，都应当说是最初形态的智库，它表明对“智者”作用的重视，很早就构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或者成为史书中的英雄，或者成为民间巷尾的传奇人物。这表明，作为最初具有传奇式色彩的个体知识精英参与决策的智库形态，在历朝历代都受到国家治理者的重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核心决策者倡导的“礼贤下士”“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和“贤士”“谋士”“幕僚”恪守的“诤言进谏”，形成了中国古代“幕僚文化”的内在张力，也清晰展现“进谏 - 纳谏 - 推行”链条式决策话语权的初始形态。这一文化层面的内在张力也影响着以内生型和嵌入型为主的中国智库发展。

事实上，社会中权力分配是十分不平衡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阶层的影响，还是近代知识分子在国政治理变革中的参与，都表明知识精英比普通民众在政治权力的知识采集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当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个知识精英难以满足政治权力知识采集的需求，组织化的知识精英群体——智库，应运而生。

2. 知识精英群体影响决策的大学智库话语体系逻辑。作为现代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智库真正发展于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目前正处于智库改革创新、力求新突破的时期。中国大学智库的发展主要聚焦于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学智库发展远远滞后于世界智库发展，实质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智库，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政府决策中的话语权及实际功用有限。而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党政关系”“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不同所有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经贸关系”进行着深刻调整，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个知识精英难以满足政

治权力知识采集的需求，作为组织化的知识精英群体，大学有着独特的学术优势，以“集团化”的方式参与决策，大学智库成为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从逻辑形态上看，这一阶段大学智库的发展逻辑基本上是“依附式”的，即主要围绕政府提出的政策问题或意图展开研究，其基本的政策研究定位是服从和服务于政府的决策与政策推行，重心在于为政府的政策推行作前期准备并对实践问题做预见性研究，形成的政策建议基本上是政府推动政策的阐述、配套、深化和推行的方法方式。大学智库话语权主要体现在服从和服务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其政策建议与政府需求保持高度一致性，散见的前瞻性、独立性、差异性研究，一般都如昙花一现，未形成实质上的影响力，更谈不上话语权。这种政府主导的智库发展逻辑与传统文化影响下嵌入型或内生型智库发展逻辑是一致的。这种聚合的发展模式，其核心特征在于政策立场的一致性，从而带来了政策执行的高效率。而正是这种高效率推动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高效的政策决策和执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大学智库走出了一条与世界不同的“中国模式”智库的发展之路。在驱动发展的同时，“依附式”发展逻辑和话语体系，也带来了许多改革“后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大学智库由于从属于政府的立场，而没有树立并恪守体现自身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价值传统，也没有形成自身能够独立运行的制度化体系，从而难以产生世界级一流智库。

3. 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大学智库话语体系逻辑。伴随“中国模式”与国际化、全球化的深度融合，我国当前改革全面向“深水区”推进，从形态上看已经进入了一种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而对于大学智库，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一个显著形态是政府的政策需求更趋向于战略思维和长远发展，这就需要更多的前瞻性、战略性、预见性研究。“依附式”的大学智库话语权逻辑传递路径是“政府出题 - 智库干活 - 政府采纳”，这种模式下政府的政策需求往往是明确的，基本上处于政府要推动某项政策前后的聚合研究，目标明确，简单直接，话语权的产生取决于能否获得政府这个“题”或项目。而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代政府的政策推行逻辑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形势变幻，很大程度上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直接把握政策的定位和走向，这就需要不同政见之间的博弈，最终实现政策的均衡和推行。在这种“均衡式”的话语逻辑形态下，大学智库话语权产生的逻辑起点发生了悄然变化，“智库研究 - 政策博弈 - 政府（社会）采纳”的话语权形成路径，要求大学智库要获得话语权必须有“真材实料”，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需要大学智库面向未来，开展创造性研究。然而中国大学智库大多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种逻辑变化或不够重视这种逻辑变化，这也导致与“中国模式”硬实力的发展及影响力的扩大相比，中国大学智库没有达到与之匹配的软实力。

二、现行大学智库发展的困境

改革开放30余年，大学智库基于“依附式”逻辑模式，参与政策研究，影响政府和社会公共决策，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成就了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也为大学智库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发展埋下了“功利化”思维困局。面对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复杂格局，政府对大学智库政策研究的需求日趋旺盛，无论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还是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都释放了建设世界一流智库的信号和雄心。面对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智库热潮，处于“依附式”向“均衡式”逻辑转换的大学智库，发展的基石在于厘清“依附式”逻辑的思维困局，“破茧成蝶”。

1.“依附式”逻辑滋生“获取资源（项目）= 发展机遇 = 话语权”的思维模式。大学智库“依附式”逻辑的核心特征在于智库依附于政

府生存和发展，滋生了功利化的“获取资源（项目）= 发展机遇 = 话语权”的思维模式。在市场化程度已经充分发展的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大学智库领域的改革普遍落后于国家其他领域的改革，“依附式”的资源驱动型发展模式仍然是目前国内大学智库发展的普遍形态。虽然一些高水平大学智库正在力图逐步摆脱这种发展模式，但面对大学智库间日益激烈的竞争，“获取资源（项目）= 发展机遇 = 话语权”的思维模式，仍然是大部分大学智库领导者的显性或隐性思维。组织化、制度化、模式化的功利思维困局，导致无论是领导者的更替、还是研究者的变更，都难以彻底改变大学智库发展的功利化特性。追逐功利本身有一股向上的驱动力，尤其是对个体而言，适当的功利是具备一定正能量的，但组织化的功利，对一个组织特别是学术组织的伤害，却是难以估量的。对大学智库而言，在今天政府层面推动的智库发展热潮中，“功利场”的困局如无法打破，很难想象能够产生与“中国模式”硬实力的发展及影响力的扩大相匹配的一流智库的软实力。

2.“依附式”功利化的组织结构导致组织者或领导者强势追逐外部资源的形态特征。“依附式”逻辑的大学智库组织结构往往是由学校行政主导，从智库组建到凝练研究方向，再到人员组成架构等等，行政主导的路线图非常清晰。行政力量强势介入的好处在于“双高”：一是对接外部资源的高效率。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大学的行政力量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联，实质上就是一种“依附”关系，由学校行政对接政府部门本身就是现今国内大学运作的制度安排。政府又是决策研究的最大消费者，由行政力量对接政府部门，“拉活”“拉资源”对接起来“得心应手”。二是大学内部聚合效率高。现今大学内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功利场”，学科与学科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纯学术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少，利益的博弈却越来越多，由行政力量主导校内资源的整合，可以说是一个现实的选择。由此，国内大学智库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体现出行政主导的组织形态，而这种形态在智库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其“双高”的优势，显然会有一个短期的“繁荣”效应。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繁荣”很大程度上是“脆弱”的。因为政府作为政策研究的消费者，大部分需求是明确的，甚至是功利的，是当下之“急务”，需要“短平快”的决策研究以及政策建议。而这种节奏，对大学智库的长久发展伤害甚大，一是为获取政府资源而导致严重的政策研究功利化。二是这种外部需求驱动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并非承担智库所擅长或关注的领域。这就导致了国内大学智库甚少成为一流智库的症结，没有一脉相承的价值传统和政策流派。

3.“依附式”外部需求理论导致研究者“研究立场”的动摇。基于“依附式”大学智库发展逻辑，大多智库研究者没有恪守自身的研究立场、原则及优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趋利避害”，有利可图的就“一窝蜂”，无利可图的则“敬而远之”。研究者无立场本身是一种悖论，谁都不承认自己没有立场，但从现实大学智库发展格局上看，大部分智库研究者无立场、无格局。政府作为政策研究的消费者，其眼光、立场往往是具有一定的“短视”心态的，而作为知识精英的智库研究者，应该着眼于政策的可持续和科学性，着眼于“有远见”的中长期战略发展，以便与政府的“短视”行为形成互补，这种互补往往就形成了某种政策决策的均衡，从而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持续性。但现今大学智库政策研究却往往是“依附性”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去“圆”或“阐述”政府的政策，而没有从政策研究自身的科学性、持续性入手，在政府启动政策决策之前既没有积累和研究基础，在决策启动之后又缺乏思想的高度和大的格局，而处于附庸性的从属地位，没有恪守自身政策研究的学术价值传统，没有自身独立的“政见”，显然在这种发展状态下，是难以产生一流的大学智库的。

三、建构大学智库话语权的路径选择

1984 年约翰·W· 金登出版了《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提出并阐述了多源流框架。就我国的国情而言，多源流分析框架特别适合解释重大事件或危机事件发生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 尤其对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它不但能够解释公共政策的生成和发展过程，而且可以预测政策的变迁趋势。三种源流的理论框架呈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智库嵌入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实现“均衡式”发展的技术路径。

1.“问题源流”是大学智库获取话语权的逻辑起点。智库的首要职责就在于找准问题，分析其根源，抓住问题的实质，以便提出对策和应对的方案。这是智库创新能力的基础。就政策研究而言,“新问题”的起点一定是源于“问题源流”,“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研究“新问题”的结果。“问题源流”为大学智库确定政策研究领域及方向提供了导向和引领，可以说“问题源流”是大学智库决策参与，获取话语权的逻辑起点，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把握好“问题源流”的逻辑起点，大学智库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智库研究方向不能太“功利”。智库研究和服务的指向要明确。要通过“问题源流”倒逼智库、研究人员的定位和研究方向的确定。作为决策咨询的消费者，政府或市场往往需要着眼于解决眼前问题，制定近期政策，这势必要求大学智库聚焦“问题源流”做综合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从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培育重点研究领域和特色。大学决策咨询研究应有适合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但功利化是不可能产生一流的大学智库的，一流的大学智库必须坚守自身的特色和价值，没有自身擅长领域的研究，没有特色的“大而全”，注定是“昙花一现”。

2.“政策源流”是大学智库获取话语权的核心。“政策源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围绕“问题源流”而产生的、不同的并为大学智库所恪守的“政策流派”，体现为智库恪守自身研究立场所提供的研究报告，包括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的定位是“全球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成名的关键。大学智库话语权的获取核心在于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高质量的“政策源流”和品牌效益。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围绕同一“问题源流”开展政策研究而产生“政策源流”应具备“多样性”和“独立性”的特征，即同一问题不同智库应有不同的“药方”，可以是方向上的不同，也可以是操作层面的不同。否则，又将陷入“千篇一律”的尴尬境地。“有中国学者论说：凡著述，有经验性、实用性而无理论性、前瞻性，失之过浅；有理论性、前瞻性，而无经验性、实用性，失之过虚。”可见，只有具备前瞻性、理论性、经验性、实用性的“政策源流”，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

3.“政治源流”和“政策之窗”的把握是大学智库获取话语权的关键节点。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大学智库尤其要主动追踪和高度关注“政治源流”的变化，洞察和把握“政策之窗”开启的时机 , 否则“政策之窗”可能“稍纵即逝”。同时，要发挥中国特色治理语境下，大学智库与政府机构制度化关联的优势，与政府部门维持特有的“均衡式”联络渠道并形成互动，确保在“政策之窗”开启时“政策源流”的高效传递和信息反馈。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大学智库一定要恪守“用”与“不用”的价值理性。“不用”或是“政策博弈”的暂时“落败”，或是政策时机的现实考量，或是政策研究本身的缺陷，都应“坦然面对”。对那些暂时未能得到采用的“政策源流”，作为理性的大学智库不可轻言放弃，而是要组建一个成果库，以备不时之需或今后之借鉴。

（作者简介：张宏宝，华南师范大学社科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摘自：《中国高教研究》2015 年第 10 期】

建立自我评估制度 健全质量保证体系

黄宝印 徐维清 郝彤亮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在加快构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过程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着力改革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制度，推进学位授予单位建立常态化的自我评估制度。

一、以自我评估为重点，改革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从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实践经验看，建立符合本国实际的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是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的有效手段。无论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巴西、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对保证本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更加重视高等学校自我评估，更加重视人才培养，是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的共同特征。我国自1985年开始探索学位授权点评估，对推动学科建设、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学位授权点数量的增加和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评估政策不健全、评估制度不完善、评价体系不科学等问题逐步显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评估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研究生教育实际，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的评估体系，是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内涵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构建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实现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开展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启动了新一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准确把握文件要求，是做好本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关键。

第一，明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定位。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实施的一项评估工作，是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位授权点水平和学位授予质量的复核。对于“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和“不合格”的学位授权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分别做出限期整改或撤销学位授权的处理决定。

第二，以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为基础。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6年一轮，分为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和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两个阶段，以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为主。前5年为自我评估阶段，最后1年为随机抽评阶段。自我评估作为合格评估的主体和基础，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最能体现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意义与价值。质量问题的出发点在培养单位内部，评估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作为评估主体的高校能否激发其自主性和能动性，体现质量保障的自觉意识，发现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修正和改善。

第三，建立学位授权点退出机制。

学位授予单位可以通过自我评估，根据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有关办法，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自身条件，及时撤销或调整部分学位授权点，从而促进学科结构不断优

化。对学位授予单位不主动调整、且达不到基本水平的学位授权点，国家将实行强制退出，从而打破学位授权点终身制。

第四，统筹各类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

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作为全面的诊断式评估，是各类评估工作的基础，各单位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学术学位授权点与专业学位授权点、博士学位授权点与硕士学位授权点，合理安排评估，最大限度地减少院系的负担。原则上每个学位授权点在一个评估周期内只评估一次。

二、强化诊断作用，建立常态化自我评估制度

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中，最基础、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是培养单位自我评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自我评估为诊断式评估，是对本单位学位授权点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检查，要根据本单位的办学定位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从目标定位、研究方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资源配置、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考察学位授权点的目标达成度。通过建立常态化自我评估制度，实现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的新常态，实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转型升级，实现高端人才培养的转型升级，进而支撑、推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这既是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研究生教育依法治教、依法施教的必然要求。

第一，体现办学意志，重在提升质量。

学位授予单位要充分发挥办学自主性，从本单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面临的问题、发展方向等方面，系统规划自我评估，科学确定评估目标，重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评估，考察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教育目标的达成度，持续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办出特色。

第二，坚持因校制宜，统筹评估安排。

自我评估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需要学位授予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适合本单位特征的自我评估方式。学位授予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自主确定评估方式和评估程序，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开展学科国际评估或质量认证，也可以开展同行专家实地评估。

第三，自定评估标准，反映办学水平。

自我评估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由学位授予单位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和质量标准，自行确定。要求各单位的自我评估标准必须与本单位办学水平相一致，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不得低于国家制定的《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第四，突出人才培养，合理确定内容。

此次学位授权点评估将人才培养做为评估的重点，从抽评要素看，17 个评价要素都是围绕人才培养设计的，其中 10 个要素直接涉及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包括招生选拔、课程教学、导师指导、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学术交流、分流淘汰、论文质量、学风教育、管理服务、就业发展等方面。自我评估的内容也必须突出人才培养，在此基础上，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自主确定的评估目标，增加评估内容。

第五，科学使用结果，优化学科结构。

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自我评估结果，结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自身发展情况，按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有关办法申请放弃或调整部分学位授权点，推动存量调整，不断优化学科结构。未开展自我评估的学位授权点视为自动放弃学位授权，按不合格学位授权点认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结果，对部分学位授权点做出限期整改或撤销学位授权的处理决定。撤销授权的学位授权点，5 年内不得申请学位授权，其在学研究生可按原渠道完成学位授予。

第六，强化以评促建，提高学科水平。

评估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改进和提高。学位授予单位要根据专家评议意见确定学位授权

点自我评估结果，根据评估结果，结合本单位发展规划，提出学位授权点调整意见，并根据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结合评估专家意见，制定各学位授权点的改进提升方案。改进提升方案应具有可操作性，包括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

三、完善制约机制，确保自我评估取得实效

自我评估是保证质量的有效手段，须完善制约机制，激发内生动力，使学位授予单位明确自我定位、不断追求卓越，避免“重指标、轻内涵，重结果、轻过程，重对上、轻诊断，重形式、轻改进”的倾向，确保评估取得实效。

第一，国家发挥引导作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部署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过程中，以通知附件的形式发布了《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南》，着力推动学位授予单位完善自我评估机制。此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还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按一级学科和专业类别分别制订《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为学位授予单位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提供依据，为导师培养学生提供参考，为教育行政部门开展质量监督提供标准，并加强评估结果与教育资源配置的有机衔接，发挥评估的导向作用。

第二，充分发挥省级统筹作用。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对本地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监管力度，做好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积极推动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区域协作机制建设。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由各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安排本地区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指导各学位授予单位做好自我评估。通过评估，推动本地区学科结构调整，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建立自我评估组织协调机制。

学位授予单位要树立科学的自我评估理念，以人才培养为重点，自觉进行周期性诊断检查，建立自我评估组织协调机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自我评估。根据本单位学位授权点数量、学科结构和院系设置等情况，统筹规划评估工作，积极动员，提高全校人员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在全校形成共识，确保全员参与。

第四，发挥信息公开的监督作用。

国家建立“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学位授予单位制定的自我评估方案和各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均须按时上传至“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学位授予单位要保证自我评估材料的真实可信，对公开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学位授权点，将直接列为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视为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将撤销学位授权。

总之，建立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制度，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长期性、复杂性兼具的工作，需要学位授予单位、院系、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参与，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统筹引导，需要行业部门、学术组织和社会机构的协同配合。各学位授予单位要高度重视，统筹部署，全面做好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为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简介：黄宝印，教育部研究生司副司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2015 年第 11 期】

从主体关系看深化高校科研领域综合改革的取向

刘志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要“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由此决定了中国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领域亟需进行根本性的、系统的、制度性改革。通过较为彻底的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我们才能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才能通过教育发展获取建设创新驱动国家的红利。高校科研领域的综合改革说起来千头万绪、千言万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其最基本的改革线索，无疑就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和有力的工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内容中涉及高校综合改革的最基本线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创办一流特色高校的发展目标；二是要求“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三是根据学校目前治理混乱的现实，首次提出要“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四是主张“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检测”，由此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政校关系以及高等育评估检测机制。不难发现，这些基本的综合改革内容大多是基于高校的主体关系线索来展开的，它们或在更高的层面上决定了高校科研领域的综合改革进程，或与这一具体的改革任务直接相关。显然，这是一种探索高校科研领域综合改革的有用的视角、有力的工具和有效的方法。它可以使我们避免忽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改革问题；避免纠缠于不应该由教育主管部门层面过问的具体细节问题，而把重点放在解决带有方向性的本质问题上。

归纳来看，在高校主体关系线索中，与深化科研领域综合改革有直接关系的，主要有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以及高校内部的关系这两条线索。科研领域高校与政府的关系综合改革，主要涉及这么两个问题：

一是要让高校更多地接受来自社会、市场和全球的科研评价，让其在同行中进行学术市场的竞赛和竞争，而不是主要接受来自于教育行政机构的评价。现在以教育主管机构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对高校的评价，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学科、人才、经费等一系列涉及学校生死的大问题，因此学校不可能不紧紧地围绕政府的指挥棒转，不可能不把政府对校领导的指标考核压力，自动转化为对全体教师的评价压力。虽然我们不能说来自于教育行政机构的评价都是误导的，但是行政评价的特征和性质决定了它与学术机构的自身发展规律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矛盾，容易阻碍中国大学创新能力的提升。如容易把学校老师引入严重的追求行政利益和行政级别的轨道，用指标化、数量化的方式把复杂的科研创新活动简单化，导致学校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导致学校科研活动不关注国家需求和市场需要，导致学校与上级之间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无创新意义的零和博弈，等等。因此，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总体改革要求，按照学校、学术、学生自身的发展规律，让学校拥有更多办学自主权，就是要让学术机构具有更多的学术性，让学校更像学校，最重要的是要让学校更多地接受来自国内外学术市场的评价和竞争。

二是要逐步放弃以产业政策办法管理高校的做法，把多如牛毛的重点支持、重点倾斜、重点扶植等政策，改为对高校的发展环

境、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和学术道德进行正面激励和负面监督的柔性管理方式。与对产业部门实施产业政策一样，政府对我国高校运用的教育类产业政策，目标是追赶型战略中的赶超世界一流大学，特点是事先的、行政化的以挑选“输家”和“赢家”的综合支持措施；结果不仅仅是高校之间的不均等竞争，而且也是中国高校始终只会围绕政府转，而不会围绕学生培养转、不会围绕学术竞争转的主因。在大量的诸如学校等级评审、重点学科评审、一级学科评审、博士点评审、科研基地评审、本科教学评估等活动中，政府主管机构既深入地干预了高校微观的办学自主权，又把学校的主要精力和时间引导到做材料、报数据、拉关系等方面，更使一些后发型学校被剥夺了通过竞争发展、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的公平机会。结果我们评出了许多行政等级高的学校，高校追求行政化趋势愈演愈烈。指导实施这种教育类产业政策的理念，其实是骨子里相信竞争创造的奇迹可以被人为打造，认为政府是无所不能的。未来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的推进，教育类产业政策需要向公平竞争政策过渡。政府教育行政机构应该把一部分科研资源按照“普惠制”的要求，平均分配给具有基本教育资质的高校，其余部分则应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竞争分配的原则由社会中介机构搭成的科研平台进行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检测”，就是要求政府教育管理机构成为全面转向依法管理高校的行政主体，着眼于运用基本规则对高校的发展环境、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和学术道德进行引导、监督、评估和激励等方面工作。

按照“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要求，根据高校内部的主体关系线索，我们重点来厘清高校科研领域综合改革中的几对重要的主体关系，同时根据改革的基本要求，准确地来界定主体间的功能定位和角色定位：

一是学校与学院（系）的关系。我国的大学一般是由综合性的、多学科的学院组成，学院往往是按专业集聚的原则组建。集聚和集中的学院被统一在大学的门下，由大学这个最高服务平台帮其解决“外部性”问题，即学校对学院的主要职能是强化学院之间的学术互依性和互补性联系，在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中进行协同创新、培养综合素质人才；负责解决学院这一层级所解决不了的、属于专业和学术以外的发展环境问题，如学校统一的发展规划、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人财物的运筹，学校与社会、政府的联系和关系协调，等等。而学院这一级则专注于学生培养、科学研究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因此就大学与学院的关系看，大学部门应该只是高平台的服务机构，众多的学院才是大学的主体、核心和灵魂。弄错了这种定位，就脱离了办大学的根本目的。但是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中，由于行政关系的不断渗透和强力入侵，大学往往演变成了办学院的主体，学院也往往成了大学的附庸。这一格局既不利于发挥学院一级作为教学、科研主体角色的积极性，也使大学行政部门权力过大、事务杂乱、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更使大学行政机构演化为配置学术资源的中心，成为“管理”下属学院的权力部门。未来科研管理治理结构的改革，必须按照“院为实体”的改革取向，从目前的“校办院”转变为“院办校”。也就是说，要在校院之间的纵向分权、放权、减权和限权的改革中，让学院独立自主地负责学生、学术的运作，让其获得更多的对学生、学术的资源配置权力，使其获得招聘、发展和评价教师员工的自主权；进行校内综合财务改革，将部分财权下放，以激发院系创新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

二是学校与教师的关系。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妥善处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如何对教师进行分类管理，让每个教师都进入

兴趣和能力导向的晋升发展轨道；二是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既用竞争机制遴选出优秀教师，又实行符合人性的终身教职制度；三是对处于各种轨道的教师，如何进行科研考核并依据科研绩效进行晋升。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承认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在一些人身上不能兼得。现在许多高校也开始学习欧美的教师管理体制，纷纷将教师分成三类管理：第一类是做科研的，第二类是做教学的，第三类就是两者兼具的。做科研的，就用学术水平评价，做教学的就用教学质量去评价要求。学校的主力教师还应该是教学科研并重型的。近年来，国内大学为了上水平、上档次，建设“研究型大学”，纷纷走向了“重科研轻教学”的极端。不但导致了科研本身的异化，而且也影响了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更使学校偏离了大学的使命和信仰。消除大学这一不良现象的对策，就是要对教师进行分类管理。其实，世界著名大学里都有专职教学职位。让那些讲授基础、实验或案例课程的老师，或者那些授课效果好、但研究能力不一定很强的教师担任专职教学教师，这不仅可以使教师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而且也可以实现对教师的公平的包容性发展目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要承认人的体力和创造力是有周期的，是要分阶段的。欧美大学据此假设普遍实行 tenure-track 和 tenure 体制。前者是“不升迁即离开”，后者是终身教授制度。tenure 是对教师教学、科研业绩进行同行评价基础上所实施的合同制，是基于确保有才华的学者献身教学事业的一种时间较长的制度性承诺，是对有成就的学者价值的一种肯定。实施大学教师终身教职的目的，在于保证拿到这个身份的教研人员，在不犯大错的情况下具有学术自由。但 Tenure 不是施舍的，是要用 5-7 年左右 Tenure-track 期间或之前的学术成果贡献、承担被淘汰的风险而换来的。因此对年轻人来说，Tenure － track 竞争制度就显得十分激烈和残酷。为了防止吃大锅饭和终身制的弊端，基于效率与公证并存的原则，目前中国许多一流大学正在引进和改造这一综合性的人事科研制度。笔者认为，有效地实施这一制度的前提，首先是要有可靠的办学经费来源，使进入这一残酷竞争轨道中的年轻人可以拿到有竞争力的薪水，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吸引更多有志于高校职位的青年才俊加入知识创造体系。另外，也要在操作中注重国情，先走“双轨制”，即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增量改革措施，保证学校科研人事制度的平稳过渡。

对于第三个问题，tenure-track 制度能否提升高校教师学术水平，关键取决于对科研业绩的评价制度是不是公开、公正、公平。科研评价制度对教师队伍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的、重要的导向作用。过去我国高校的科研考核办法，存在的主要缺陷是追求数量，考核过于短期化。这是科研指挥棒“GDP 化”的主要表现和结果。未来高校自主办学能力增强之后，各个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寻求办学特色，使科研考核办法与学科发展方向和特色一致，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全国一把尺子，甚至逼得高职高专类学校老师都在追求发 SSCI/SCI 或 CSSCI 论文。改革的主导思路是：突出质量和特色导向，弱化量化考核功能，营造宽松的科研氛围，给优秀学者留出发展创新的充分空间。具体来说，一是要弱化短期化的“科研指挥棒”对教师长期科研目标和兴趣追求的干扰，鼓励长期的科研行为；二是要淡化“学术 GDP”的量化考核办法，鼓励教师多出创新含量大的高质量学术成果；三是要把科研评价制度作为促进学校特色发展的工具，对教师进行分类考核和学术评价，主要依靠和依据来自同行的、社会的评价，鼓励教师独立自主治学。让“学

术发展”和“教师发展”和谐并存、相互促进，让科研考核制度成为促进学术兴趣、学术积淀和学术创新能力的动力，而不是阻碍；使之有助于教师成长、大师养成，而不是成为羁绊。

三是学校与教授的关系。构成中国大学自主办学的主要内容，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这其中的关系说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要通过对学校的全面行政管理，保证教授的自主治学。教授治学当然包含教授讲课、编教材、指导学生、主持科研项目、发表论著等活动，但从教授群体层面而言，教授治学主要是指：通过学术委员会这一重要的组织和载体形式，由教授群体的杰出代表们去行使最高学术权力，决定学校内部的一切学术事务。虽然现在各高校都在其《学校章程》中对学术委员会的职能和任务给予了重点描述和界定，但是在实践中教授治学的目标并没有因此落实到位。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一是一些学校的很多学术事务很少或者根本不放到学委会进行咨询、审议或审定，学校党政会议之前也很少听取学术委员会教授的意见，使教授治学流于形式；二是现在一些学校不善于把学校的信息与教授们进行交流和分享，教授因缺少对学校学术事务的了解，难以有效地参政议政，从而影响了学委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三是许多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中，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人数过多，双重兼职的人数过多影响了学委会的代表性，开学委会与开行政会议之间的差异不大。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来自行政权力对普通教授的傲慢，对构成学校核心活动的学术的轻视，教授治学这种内部治理机制缺少真正的法治保障。解决的办法只能建立保障机制，要求和监督学校党政领导坚决彻底贯彻落实《高等教育法》和《学校章程》。除此之外，就是要大力培育教授群体对学校的自主治学意识和能力。

四是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在过去传统的理念中，学校就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学生不存在科研关系。其实，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除了硕士生、博士生早已经是高校科研的主力外，本科生也应该尽早介入老师的科研活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尽早地、深入地介入到学校和老师的科研活动，这对于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代科学研究中，突破性、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往往来自于年轻人的大胆挑战。为了适应科技发展新常态、新趋势，中国高校中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应该从过去的“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实现这种转变有两层含义：一是应该鼓励教师在科研活动中尽可能多地吸纳本科学生参与，让其参加开题研讨、问卷设计、社会调查、数据处理、研究报告写作等学术活动，尽早进行科研训练，掌握科研程序和方法，培养创新能力。同时也可以在老师指导下，在其课程中增加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如试行新生研讨课教学模式、假期社会调查研究报告计划、进行“挑战杯”竞赛等；二是在教学活动中，要从教师“教”的被动性接受，转变为调动学生主动去“学”的积极性。欧美大学现在流行的“翻转课堂”、“慕课”等新颖形式的“学”，就是在互联网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性的有效探索，值得中国高校认真学习消化和创新。

（作者简介：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

【摘自：《东方学术》2015 年第 1 期】

加强院校研究 深化综合改革

廖旭梅

2015 年 7 月 10 至 12 日，“院校研究与高校综合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 2015 年年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此次会议由山东英才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百余所国内外高校的 500 余位院校领导及专家学者参会。

为促进与会代表的广泛参与与深入探讨，本次年会首次采用主论坛与四个平行分论坛的方式举行。与会代表围绕“院校研究与高校综合改革”的主题，从“高校发展战略规划与‘十三五’规划制定”、“高校课程建设与教师教学发展”、“本科生学习与发展调查”及“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四个方面进行了交流与研讨。

一、高校发展战略规划与“十三五”规划制定

高校发展战略规划是院校研究的重要内容。2015 年既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又是“十三五”规划的谋划之年。与会代表对“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总结，对“十三五”规划制定的重点问题展开了讨论。

1. 高校发展战略规划的价值

面对组织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和日益激烈的竞争，高校战略规划对学校的科学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1）规划为高校指引未来路径。青岛农业大学副校长杨同毅教授认为，规划是学校发展的长远谋划，规划为大学理清目标和方向，具有方向引领和工作指导的功能。（2）规划具有凝聚发展力量的作用。济南大学党委书记范跃进教授认为，发展战略规划是大学发展的顶层设计，是建设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建设这样的大学的蓝图，是大学形成共识和凝聚发展力量的重要载体。（3）规划是提高高校资源利用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刘亚荣教授提出，目前众多高校在应对竞争中容易产生两个资源内耗，即激励不相容内耗和单要素发展的资源内耗，解决这两个内耗问题、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在于战略规划。

2. 提高高校发展战略规划有效性的措施

充分发挥战略规划对高校发展的实际作用，重点在提高战略规划的有效性。（1）战略思想是确定战略目标、重点的基本依据。临沂大学原校长韩延明教授提出，大学战略规划首先是要有思想的，是一套由思想引领的学校发展的设计。（2）环境分析是高校制定战略规划的重要起点。如基于环境分析显示的生源下降危机和对自身发展方向的觉醒，西安欧亚学院提出了战略转型。（3）应站在战略管理的高度制定战略规划。规划的价值重在执行和落实。长江大学赵映川老师指出，战略规划要遵循从理念到目标到措施到行动的逻辑，要围绕大学愿景和使命，确立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制定规划方案、明确战略举措，规划实现路径。南京农业大学王海蓉老师介绍了运用“战略地图”对高校战略规划进行细化的方法。在“战略地图”中，除了对愿景、使命和价值进行描述，还进一步细化了各子目标、子主题及其支撑保障。（4）战略规划制定和实施需要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厦门大学博士生韦莉娜认为，高校要重视规划文化培育，加强对战略

规划的动员、宣传和学习，加深大家对战略规划的理解，使大家形成共识。（5）资源匹配是高校战略规划有效实施的关键。高校的任何发展都需要资源的支持，规划看上去再完美如果没有相应的资源匹配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华桥老师强调，规划要与学校财务资源相结合。（6）要善于利用“外脑”。高校可以邀请校外的规划专家参与学校的战略规划制定，利用外部智力资源提高规划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及其权威性。

3. 制定高校发展战略规划的院校经验

多位与会代表介绍了所在高校发展战略规划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华中科技大学陈廷柱教授结合该校案例展示了公司战略在大学中的应用，认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历程中曾经采用一元化、纵向一体化、同心多角化、整体多角化等公司战略，并对该校“十三五”战略规划的制定提出了从做加法向做减法转型、从“校办院”向“院办校”转型、经由国际化试点学院向国际一流大学迈进等建议。西安欧亚学院赵军镜老师介绍了该院的战略规划和转型变革实践。西安欧亚学院2005年以前主要是模仿公办高校、顺应政府评估导向发展。2006年开始学校意识到应探索出适合自身的路径。经过研究后，学校开始了从教学型向应用型、从以学校发展为本向以学生发展为本、从规范效仿向自身战略方向引导、从强调资源投入向强调有效产出、从单一学费向多元收入的转型。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谢辉祥以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介绍了行业特色型大学的发展战略。电子科技大学基于组织内外部环境扫描评估和对欧美行业特色型大学发展趋势的分析，将“初步把学校建成在电子信息领域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学”作为“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同时明确了战略变革的四条路径，即有组织地强化从“电子行业”跨界进入“行业电子”，加强基础创新研究和行业精英人才培养，加快从单科性大学向多科性大学的结构搭建，利用“互联网＋创新创业”来实现方式的转变。

二、高校课程建设与教师教学发展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变革，课程建设是最基本、最关键的因素和环节。院校研究分会分别于2012、2014年举办过主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变革”和“大学课程建设与本科教学改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年会继续设立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议题，并将教师教学发展议题纳入其中。

1. 推进高校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1）当前本科教学和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陆国栋教授指出，中国大学教育存在三个基本问题，即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区别不大，大学间教学模式区别太小，国内大学教学与国外大学教学差别太大。具体到各个学校，有太多的“水课”；太多的“低头族”，学生除了“人不在”，更多的是“人在，心不在”；教师以固化模式单向传输，学生为作业、为考试而学习；教师关注科研，培养自己比培养学生来劲；教师薪酬与教学弱相关、零相关，甚至负相关等。

（2）推进高校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策略与实践。首先，实现从重“教”到重“学”的理念转变。陆国栋教授认为，大学教学要实现三个转变：以教为主（老师满堂灌）向以学为主转变，以课堂为主（过分重课堂）向课内外结合转变，以结果评价为主（过分重分数）向结果过程结合转变，以此让“考生”变学生，教师成“导”师，教材成为参考书。大学要促进学生自己去“悟道、求业、生惑”，而不仅是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台湾辅仁大学张德锐教授认为，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下，帮助学生掌握自主学习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至关重要。其次，创新人才培养与教学管理模式。南京农业大学罗英姿教

授在对江苏8所高校全日制学术型脱产三年级及以上博士生进行调查分析后提出了联合一体化博士生培养模式（Combined-Integrated Model）。这种培养模式以博士生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引入市场力量，评价方式由结果评价转变为过程性评价。中国农业大学金帷老师以该校生物学院2009年以来开展的一系列院级教学组织及管理制度改革为例，指出教学改革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克服学院原有教学组织管理结构存在的弊端，更深层次的则是需要在学院内部构建重视教学、投入教学、导向卓越教学的管理机制和组织文化。湖北长江职业学院夏杨福老师认为，现有高职院校的教研室组织架构大多是学习和延续过去普通本科高校的模式，不适应高职院校发展的要求。该院探索了教研室的重构改革，将教研室转变为由专业教研室、实训室、工作室三位一体组建而成的专业“教训中心”。第三，转变教学模式。北京大学熊煜老师介绍了该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小班课教学”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影响机制的研究，指出小班教学通过影响学习动机，进而提高学生参与度，最终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第四，转变评估方式。评估包括学校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及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浙江大学对学生学习评估进行了诸多创新探索。陆国栋教授介绍，该校对学生学习评估的改革思路为：规范面上考试模式、深化点上考试模式和变革考试时间。他特别介绍了该校“点上”考试模式的一些改革实践，例如“三自”模式——学生自主设计考题、自我测试、自行评价。通过这些方式，学生做多少题目是相对次要的，搜寻题目的过程就是研究学习的过程，判断题目的难易也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赵立莹老师指出，教师对学生的成绩评价和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价由于利益相关可能都会在彼此关照中顺利过关，因此应进行学生评教多元化路径探索，从定量评价到质性评价，从问卷调查到征文描述，从管理部门组织到教师自主组织。

2. 促进教师教学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教师教学发展，建立了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多位与会代表分别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定位、发展思路、组织支持、活动设计以及促进教师积极参与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目前，教师教学发展组织在学校治理体系中的定位相对模糊，究竟应属于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教学管理部门还是学术研究机构仍存在争议。对此，中南民族大学康翠萍教授认为，要树立一种学术理念，用学术视野来实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赵立莹老师认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应定位于服务型专业机构。

华中科技大学雷洪德老师认为，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不能仅靠教师经验积累和自然发展，它需要组织的支持。他从组织支持的视角分析了文华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设立过程中的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和问题源流。该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在内外部因素共同支持作用下，通过设立文华讲坛、教学工作坊和发展工作坊等多种模块为不同需求、不同层次的教师提供教学发展服务。

三、本科生学习与发展调查

高校不仅要重视提升教师“教”的技能，更要重视学生“学”的效果。本科生学习与发展调查作为评估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和院校研究为高校提供决策支持的重要工具，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了解大学生在校学习经历，揭开教育（学习）过程“黑匣子”。来自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在各自学校进行本科生学习与发展调查的经验。

清华大学团队2007年从美国将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引入中国，并进行汉

化。发展八年至今，除了推广应用 NSSE－CHINA，帮助各高校开展学情调查，还根据中国国情自主开发了大学学习与发展追踪调查问卷（China College Student Survey，CCSS）。目前 CCSS 问卷共分四类，分别是面向普通高校的绿色问卷、面向应用型高校的黄色问卷、面向毕业生的蓝色问卷，以及面向清华大学本科生进行全样本追踪调查的紫色问卷。博士生黄雨恒介绍了基于 2014 年 CCSS 全国数据的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郭菲博士介绍了社会称许性对问卷指标的影响研究并提出避免或降低社会称许性对问卷调查“污染”的建议。

华中科技大学团队自主开发了基于该校背景和实际需要的本土化、个性化的本科生学习与发展调查问卷（Student Survey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SSLD），并于 2014 年 5 月对全校本科生进行了学情调查。陈敏教授介绍了调查系统开发的指导思想与组织实施的具体过程。魏署光博士介绍了 SSLD 问卷的理论基础、框架及信效度，指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是我国院校研究国际化和本土化实践的积极探索。张俊超老师介绍了基于 SSLD 数据开展的社会性人际互动对大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研究，指出加强社会性人际互动的强度、深度与频度，对提升大学生学习效果有着积极影响。博士生廖旭梅基于 SSLD 的数据，发现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水平普遍较低，自主学习能力迫切需要提高，并为此在文华学院开展了一项旨在提升大学生自主学习水平的“你我同行，学会学习”行动研究项目。

北京大学团队从 2011 年开始在首都 28 所高校中进行了历时四年的本专科生追踪调查。该调查以学生发展理论和院校影响力模型为依据，重在考察学生发展的关键维度随着时间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杨钋老师介绍了本专科生追踪调查持续关注的大学生发展的五大维度，即学业参与、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道德价值观、职业规划和准备，并基于调查结果提出了促进大学生发展的建议。

中山大学团队于 2011 年开发出中山大学学生学习调查问卷（SSHL），并于 2012 和 2014 年两次实施覆盖学校全体学生的调查。基于这两次调查的数据，团队开展了研究型大学学生学习状态类型化研究。他们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学生分为社交型、懒惰型、卓越型、研究型、游离型、自学型六大类型，并从课堂教学、课程作业、专业学习等方面分析了学校学习资源的提供对不同类型学生学习状况转变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陆根书教授基于 2012 年研究型大学学生就读经历调查（SERU）的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在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及能力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四、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院校研究要运用理论指导，采用科学方法，对学校管理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本次年会上，与会代表就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分别从院校研究组织和专业发展趋势、院校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与应用、院校数据分析与挖掘、院校决策执行与评估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1. 院校研究组织和专业发展趋势

（1）院校研究职能。职能转变是近年来院校研究发展的一大特点。美国夏威夷大学院校研究办公室主任张杨博士指出，越来越多的院校研究机构将自己命名为“院校效能办公室”（Office of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机构职能从侧重于数据汇报和专题研究转向更加多元的包含数据报送、专题研究、评估测量、战略规划、资格认证、信息管理等旨在促进学校高效发展的职能。魏署光博士也认为，在美国，院校办学效能分析日益成为院校研究人员的主要工作领域；院校研究人员在学生入学管理及学习成果评估事务中的参与越来越多；院校研究服务对

象不仅限于高层决策者。日本东京大学刘文君博士介绍，日本大学的院校研究经过三次浪潮的发展后，也有由传统职能向多元职能转变的趋势，目前其功能主要侧重于教育质量的保证，在大学财政、运营方面的作用还不显著，但对大学管理运营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伴随院校研究职能转变的是院校研究地位的提升。张杨博士介绍，在美国，院校研究机构已成为辅助高校决策的重要机构，高校进行重要决策时习惯于咨询院校研究办公室，在其分析及建议的基础上制定和推行新的政策。

（2）院校研究机构定位与考核。院校研究办公室是学术研究机构还是职能机构？张杨博士介绍，在院校研究的起源地和迅速发展的美国，对院校研究机构的考核不是以发表多少论文作为衡量标准的，而是看为学校决策提供咨询的质量以及数据收集、信息发布的水平。与会代表表示，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对院校研究人员的评估依然沿用学术研究的制度、体制和习惯，院校研究人员在完成院校研究任务的同时，还要撰写学术论文及开展教学，这种做法有利于院校研究人员学术水平的提高及其个人的长远发展，但不利于院校研究人员集中全力为学校提供决策支持，对我国院校研究机构的定位和院校研究人员的评估怎样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应结合中国国情作进一步的探讨。

（3）院校研究人员职业素养。院校研究是通过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为决策提供支持的专门性职业，院校研究人员的职业素养对院校研究的质量至关重要。张杨博士认为，院校研究人员需要具备数据处理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学习能力，以及扎实肯干、认真负责、公开透明的做事态度和原则。

（4）院校研究方法。院校研究除了采用严格的定量研究方法，还可以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深度考察数据背后的意义，解释定量数据难以解释的问题。空军预警学院李小平教授认为，“体验性”是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院校研究作为“身在其中”的研究，具有明显的“体验性”特征。院校研究除了对数据进行客观分析，还应注重数据背后的意义感悟、经验背后的过程体验、事实背后的真相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反思和思想背后的情感体验。

2. 院校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与应用

高校管理需要从传统的经验管理走向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全面、系统、长期、扎实地建设好院校决策支持系统，可以为基于数据的决策奠定基础。目前，部分高校走在前列，已着手启动或成功建立院校决策支持系统。遵循“以师生为本，为师生服务，支持管理，支持决策”的理念，常熟理工学院于2011年建成学校决策支持系统，目前已顺利运转四年。该院院长朱士中教授表示，教师信息服务平台、学生信息服务平台及人财物三个层面的决策支撑系统对学校管理和科学决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济大学2014年3月正式启动学校决策支持系统建设，目前已有25个数据库进仓，并于2015年5月对外发布了数据应用平台。张端鸿老师在介绍该校决策支持系统“样板间”的经验时提出“事实型证据＋专用方法工具＋专家智慧”的有效循证分析架构，认为以事实为基础（evidence-based）的循证决策和以直觉为基础的经验决策（experience-based）是高校决策模式的两个重要取向。浙江树人大学建设了全国高校科研数据系统，旨在为全面、及时、动态地反映全国高校科研发展状况提供系统化的数据，实现海量科研数据的高效收集、分析和处理。

在院校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中，数据标准需要重点关注。张杨博士强调了数据系统标准化的问题，提出要建立数据收集与发布标准，确保本校多年数据的一致性及不同院校

的可比性。中山大学屈琼斐老师也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数据统计中的标准问题，建议从法律上明晰和确定高等教育统计标准，补充大量空白的高等教育指标定义，调整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统计标准。

信息系统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数据资源将成为战略资产，而有效的数据治理是数据资产形成的必要条件。针对院校决策支持系统的数据治理问题，朱士中教授介绍了常熟理工学院的经验与路径：一是所有部门及系统统一数据标准；二是教职工编码统一，一人一号，学生按学号编码，身份唯一；三是通过整合数据平台，对数据进行集成、应用和分析，使数据变活并流动起来，实现数据共享；四是建立数据维护规范，确保数据的唯一性、准确性、动态性；五是确立统计分析模型，制作针对业务管理及综合性的数据统计分析报表。

3. 院校数据分析与挖掘

数据挖掘和分析是现代院校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院校研究通过运用新系统、新工具、新模型对数据进行挖掘，使原来似乎无用的数据活起来，从中获得更具有洞察力和新价值的东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益民教授提出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进行数据挖掘，将数据挖掘贯穿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招生、学生在校生活学习、学生就业、校友跟踪调查等全过程，认为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要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华中科技大学赵仲宇老师采用数据化方法分析了该校的学科结构，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准确地分析学校学科层次布局情况、学科结构变化情况，观测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情况，从而帮助学校更精准地定位。

4. 院校决策执行与评估

院校研究为高校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政策制定后，院校研究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是应进一步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为后续决策提供更好的支持服务。

复旦大学牛新春老师以“德克萨斯州高等教育机会项目”为例，呈现了院校研究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陕西师范大学陈鹏教授介绍了该校构建多维评估模型，通过数据整理和统计程序量化评估各学院绩效的做法，认为该校在经过研究后对学院评估办法的改进体现了学校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发展的转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会长刘献君教授提出了进一步推进院校研究的思路与措施：第一，推进学校数据系统建设。目前高校数据系统建设的前提条件基本具备，每个学校基本上都成立了信息办公室或信息中心，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信息平台，在平台上建立数据中心、系统数据库、分析数据库并增强数据挖掘技术。此外，要解决数据“不干净”的问题。院校研究分会将与 2-3 所高校合作，树立建立“干净”数据库的样板。第二，继续推进院校专题研究。院校研究开展之初，院校研究分会根据中国的国情，在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力推进专题研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现在在系统数据库暂时没有建立的情况下，院校研究人员可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自己采集数据，开展研究。第三，推动院校研究组织机构建立。目前开展院校研究的机构分散，教学评估中心、规划处、教师发展中心等部门开展的很多工作都属于院校研究。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可考虑将这些机构合并并命名为院校研究中心，同时给予其职能部门和院系的优势，以更好地发挥决策支持的功能。第四，继续加强国际交流和两岸的交流。2014 年院校研究分会与美国、加拿大、台湾、澳门的相关机构和高校开展了多种方式的交流，今后要继续加强。

（作者简介：廖旭梅，江西龙南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院校研究。）

【摘自：《高等教育研究》2015 年第 9 期】

地方本科院校教育质量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烟台大学CCSS的调查数据分析

烟台大学发展规划处、教务处

一、研究背景

我国已于2002年实现了大众高等教育的目标，但是，如果只追求量的增长而不顾质的变化，将由于“无法解决增长所引起的问题”而陷于两难境地。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把“教育质量”确立为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其中“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是位居高等教育五大发展议题之首。如何评价高等教育质量？其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的培养质量。当前，以“服务质量观”为指导，让学生成为高等教育服务质量评价的主体，是评价发展的趋势。通过学生满意度评价、监测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对于高等教育从容应对大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挑战意义深远。在《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文件提出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中，审核项目“学生发展”的审核要点之一为“学生对自我学习与成长的满意度”。另外，教育部明确提出，将“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结果，作为高校编制“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重点内容之一。可见，学生满意度调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只有了解学生在学满意度现状和影响学生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才能更好地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满意度，进而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

二、研究理论基础

与满意度相关的研究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顾客满意度理论，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

顾客满意度理论是学生满意度研究的最初理论基础，出现最早的文献是1956年Iffert R E发表在《College and University》的“Study of college-student retention and withdrawal”，最早开展学生满意度研究的是1966年美国教育委员会使用CIRP测量大学新生的满意度。爱荷华州立大学两位教授Betz EL与Menne JW曾合作，研究集中在学生满意度的意义、相关影响因素及工作满意度等，其在学生满意度领域具有高影响力。Elliot和Healy在其研究中认为学生满意度是学生对所获得的教育服务的评价而产生的短期态度。很多涉及大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如“澳大利亚课程体验问卷调查”、“全美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英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都说明学生满意度是一个复杂且较为模糊的概念，但是多维度的特点是被公认的。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顾客满意度概念被引入我国。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学生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学生视角的研究在我国也开始陆续出现。近年来，我国比较突出的有关大学生学习经历的调查研究主要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自2006年开始开展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自2009年开展的“全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估研究所自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南京大学于2011年开展的“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经历调查”。这些研究均关注大学生的学习经历，把其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新视角，体现了从注重“投入”到注重“产出”的转变、从注重“教”到注重“学”的转变，以及‘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开展学生满意度调查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德里克•博克认为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就大学内部的情况来看，克拉克•克尔早就提出大学“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一切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李福华把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四个层次：核心利益相关者（教师、学生、管理人员）、重要利益相关者（校友和财政拨款者）、间接利益相关者（科研经费提供者、产学研合作者、贷款提供者）、边缘利益相关者（当代社区和社会公众）。可见，学生是高校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大学院校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学生投入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消费服务，成为高等教育中的顾客，同时拥有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等三个特征，是高等教育中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三、研究工具及方法

（一）研究工具：CCSS问卷

本研究以CCSS2013问卷作为调查工具。CCSS由NSSE-China发展而来，而NSSE-China问卷的原型是印第安纳大学开发的“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问卷。为了使NSSE-China调查工具能够帮助院校更深入地剖析学生学习的质量，清华大学课题组每年都对问卷进行调整和修订，逐渐形成发展为“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调查。CCSS问卷从学生的学业挑战度（LAC）、主动合作学习水平(ACL)、生师互动(SFI)、教育经验的丰富程度(EEE)、校园环境支持度(SCE)等五个国内外高校的可比指标调查入手，测量不同院校学生的学习投入、校园环境支持以及教师的教学水平情况；通过课程的教育认知目标(CO-C)、课程要求的严格程度(CR)、课程学习行为(SL)、课程外拓展性学习行为(ELE)、向学/厌学(SWL)、有效教学实践(ETP)、支持性环境(SE)、自我报告教育收获(SSLO)以及在校满意度(SSTF)等九个院校教育过程自我评价，形成诊断性指标，形成对中国大学总体、中国分类型本科院校教育过程和教学效果的客观评价。2013年，根据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更加注重学生自我学习行为的诊断，开发出高阶学习(HOL)、反思与整合学习(RIL)、学习策略(LS)、数量推理(QR)、合作性学习(CL)、与多元人群的讨论(DDO)、生师互动(ind SFI)、互动质量(QI)等学习诊断八项指标。

（二）研究工具：在校满意度量表

“在校满意度(SSTF)”量表包括11个维度：整体就读经历、学术经历、社交经历、学习硬件条件、学习风气和氛围、课程质量、教师教学水平、二次选择专业机会、求职就业指导、整体收获成长、向他人推荐该校。维度不仅涉及教学，即“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方面，还涉及学生对学校整体的看法、成长过程中得到的学校服务（硬件和软件），以及学生与他人（教师、同学、辅导员、行政人员）的互动体验等方面。

（三）数据和方法

2013年，全国共有75所本科院校参与CCSS调查，共发放问卷172072份，回收112322份。调查问卷经过了严格的信效度检验，并构建“985工程院校常模”、“211工程”院校常模、地方本科院校常模。

本研究以烟台大学（类属“地方本科院校”）为调查研究对象。采用完全随机抽样的方式，涵盖了学校所有的学科类型，在2.3万名本科生总体数据库中抽取1800名学生，发放1800份问卷（网络），有效回收1663份，回收率为92.4％。被试性别、年级、学科分布（见表1）。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使用软件IBM SPSS Statistics 21.0进行统计分析。除使用最常用的描述性统计方法外，还使用了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主要用于分析满意度的性别、学科、年级差异；而多元线性回归则主要用于分析学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表 1　烟台大学被试性别、年级、学科分布

类别	名称	人数	比例（%）	类别	学科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933	56.11	学科	工学	951	57.19
	女	730	43.89		理学	187	11.24
年级	一	519	31.20		文学	162	9.74
	二	458	27.54		管理学	125	7.52
	三	421	25.32		法学	55	3.31
	四	265	45.94		医学	45	2.71
					艺术学	38	2.29
					经济学	37	2.22
					农学	37	2.22
					教育学	26	1.56

四、研究结果：基本数据分析

（一）学生满意度的总体特征分析

表 2 为烟台大学在校满意度的各个指标得分状况。大学生总体在校满意度得分均值为 61.8014。从各个维度看，有三个指标得分超过 65.0，分别为教师教学水平（Mean=66.3251）、整体收获成长（Mean=66.2246）、向他人推荐该校（Mean=65.0392），课程质量（Mean=62.6860）得分超过 62.0；有两个指标得分低于 60 分——二次选择专业机会（Mean=56.4636）和学术经历（Mean=56.9419）。可以看出，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个人整体收获成长、课程质量等非常满意，而对学术经历和二次选择专业机会满意度相对较低。

（二）学生满意度与全国同类院校常模进行比较

表 3 为烟台大学在校满意度各个指标与全

表 2　烟台大学在校满意度的总体特征分析

指标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整体就读经历	1658	.00	100.00	60.7157	23.87628
学术经历	1659	.00	100.00	56.9419	23.73734
社交经历	1656	.00	100.00	61.6043	23.79777
学习硬件条件	1659	.00	100.00	61.7340	23.73203
学习风气和氛围	1658	.00	100.00	60.3237	24.53502
课程质量	1658	.00	100.00	62.6860	23.06488
教师教学水平	1659	.00	100.00	66.3251	22.96285
二次选择专业机会	1658	.00	100.00	56.4636	26.50181
求职就业指导	1659	.00	100.00	61.8344	23.87231
整体收获成长	1659	.00	100.00	66.2246	23.27997
向他人推荐该校	1659	.00	100.00	65.0392	23.38533
在校满意度	1659	.00	100.00	61.8014	19.31130

表 3　烟台大学在校满意度得分与同类院校常模比较

指标	t	df	Sig.(双侧)	均值差值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整体就读经历	12.886	1657	.000	7.55572	6.4056	8.7058
学术经历	9.870	1658	.000	5.75193	4.6089	6.8950
社交经历	6.539	1655	.000	3.82427	2.6772	4.9713
学习硬件条件	16.157	1658	.000	9.41398	8.2712	10.5568
学习风气和氛围	13.781	1657	.000	8.30368	7.1218	9.4855
课程质量	14.240	1657	.000	8.06597	6.9549	9.1770
教师教学水平	11.166	1658	.000	6.29510	5.1893	7.4009
二次选择专业机会	22.484	1657	.000	14.63361	13.3570	15.9102
求职就业指导	17.479	1658	.000	10.24444	9.0949	11.3940
整体收获成长	12.343	1658	.000	7.05463	5.9336	8.1757
向他人推荐该校	22.240	1658	.000	12.76918	11.6431	13.8953

国地方本科院校常模进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结合效应值检验，得出：烟台大学学生各个维度满意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同类院校平均水平（P<0.001）。二次选择专业机会 T 值（22.484）最大、向他人推荐该校（t=22.240）次之，而社交经历 T 值（6.539）最低，学术经历次之（t=9.87）。

（三）学生满意度差异分析

1. 性别差异

表 4 为烟台大学男生、女生在校满意度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描述统计结果显示，男生

表 4　烟台大学男女在校满意度差异检验结果

指标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F	Sig.	t	df	Sig. (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下限	上限
在校满意度	假设方差相等	2.622	.106	-1.887	1657	.059	-1.80161	.95468	-3.67412	0.07090
	假设方差不相等			-1.907	1614.21	.057	-1.80161	.94495	-3.65507	0.05185
学习风气和氛围	假设方差相等	5.969	.015	-2.561	1656	.011	-3.10444	1.21212	-5.48189	-.72700
	假设方差不相等			-2.588	1614.01	.010	-3.10444	1.19975	-5.45767	-.75122
课程质量	假设方差相等	4.026	.045	-3.143	1656	.002	-3.57802	1.13852	-5.81111	-1.34492
	假设方差不相等			-3.166	1598.88	.002	-3.57802	1.13026	-5.79497	-1.36106
教师教学水平	假设方差相等	1.540	.215	-2.876	1657	.004	-3.26038	1.13360	-5.48381	-1.03695
	假设方差不相等			-2.904	1611.09	.004	-3.26038	1.12285	-5.46279	-1.05798

在校满意度各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女生。但由表3可看出，男生在校满意度（Mean=61.01）与女生在校满意度（Mean=62.81）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还显示，男生在学习风气和氛围、课程质量、教师教学水平这三个维度上，均明显低于女生的满意度，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年级差异

使用Bonferroni (LSD)法，对四个年级的总体“在校满意度”及各个维度进行比较，（见表5）。可看出：在总体“在校满意度”方面，1年级明显高于3年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满意度具体维度方面，1年级学生对“学术经历”、“学习硬件条件”、“课程质量”、“教师教学水平”、“求职就业指导”、“整体收获成长”的满意度均明显高于一个或两个高年级学生的满意度；唯有“向他人推荐该校”维度，2年级和3年级学生的满意度均明显低于4年级。可见，新生入学后，对学校的一切都是新鲜和满意的，但随着学习、活动、社交的进展，逐步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尤其是经过4年的学习生活后，体验到了学校文化的方方面面，判断事物更加成熟，对学校更有感情，更愿意“向他人推荐该校”。

3. 学科差异

采用Scheffe法，对各个学科的学生在校满意度进行比较（见表6）得出：农学和法学学生的在校满意度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5），法学学科的学生在校满意度（M=70.96，SD=21.15）明显高于农学(M=61.26，SD=18.99)学生的在校满意度。在具体维度方面，法学学科有三个指标明显高于农学学科，分别是：整体就读经历、学习风气和氛围、二次选择专业机会；工学学科有两个指标明显低于法学学科，即课程质量和教师教学水平；在“二次选择专业机会”维度上，法学和管理学

表5　烟台大学不同年级学生在校满意度差异检验结果

指标	(I) 年级	(J) 年级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在校满意度	1年级	3年级	3.37250*	1.26610	.047	.0282	6.7168
学术经历	1年级	3年级	4.59462*	1.55603	.019	.4845	8.7048
学习硬件条件	1年级	2年级	4.13319*	1.51863	.039	.1218	8.1446
课程质量	1年级	3年级	5.06742*	1.50894	.005	1.0816	9.0532
		4年级	5.71661*	1.74122	.006	1.1173	10.3159
教师教学水平	1年级	4年级	5.41904*	1.73313	.011	.8411	9.9970
求职就业指导	1年级	2年级	6.10477*	1.52404	.000	2.0791	10.1304
	1年级	3年级	4.23394*	1.56126	.041	.1100	8.3579
整体收获成长	1年级	3年级	4.31050*	1.52651	.029	.2783	8.3427
向他人推荐该校	2年级	4年级	-6.13747*	1.80424	.004	-10.9033	-1.3717
	3年级	4年级	-4.96127*	1.83462	.041	-9.8073	-.1152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两个学科占明显优势。

五、研究结果：影响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满意度的因素

以烟台大学学生在校满意度为因变量，以CCSS问卷中综合分析五项指标、院校诊断九项指标、学习诊断八项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共线性检验，为保证条件指数（condition index）<15、方差膨胀因子<2、且各自变量都很显著，逐步分析回归后，结果见表7。方差分析中，F=242.60，p<0.001，说明回归方程能够显著预测满意度，调整R2=0.422，说明模型能够解析学生在校满意度42.4%的变异量。回归方程为：Y=0.242+0.168×ETP+0.073×SE+0.188×SWL+0.353×QI+0.161×CR，即地方本科大学学生教育质量总体满意度 =0.242+0.168× 有效教学实践 +0.073× 支持性环境 +0.188× 向学 / 厌学 +0.353× 互动质量 +0.161× 课程要求的严格程度。在被调查的预测变量中，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系数均为正，说明各因子与总体满意度正相关，其中，互动质量（QI）的Beta系数绝对值最大（B=0.353），说明这个因子对地方本科院校教育质量学生满意度的解释力最高；向学 / 厌学（B=0.188）、有效教学实践（B=0.168）、课程要求的严格程度（B=0.161）、支持性环境（B=0.073）依次次之。

（一）互动质量（QI）

互动质量（QI）（B=0.353，p=0.000<0.001），在所有因子中，B值最大，说明互动质量是影

表6　烟台大学各学科在校满意度描述统计表

指标	(I) 学科	(J) 学科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在校满意度	法学	农学	18.05673*	4.08565	.013	1.9445	34.1689
整体就读经历	法学	农学	23.47256*	5.04594	.006	3.5733	43.3718
学习风气和氛围	法学	农学	21.07289*	5.18803	.036	.6133	41.5324
课程质量	法学	工学	12.63577*	3.18178	.046	.0881	25.1835
教师教学水平	法学	工学	13.25413*	3.16154	.025	.7863	25.7220
二次选择专业机会	法学	农学	23.55446*	5.59895	.024	1.4744	45.6345
	管理学	农学	21.50901*	4.93283	.015	2.0558	40.9622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表7　地方本科院校教育质量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模型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 误差				容差	VIF
(常量)	.242	2.023		.120	.905		
有效教学实践（ETP）	.168	.025	.148	6.708	.000	.720	1.389
支持性环境（SE）	.073	.022	.075	3.328	.001	.696	1.436
向学 / 厌学（SWL）	.188	.028	.147	6.675	.000	.720	1.389
互动质量 (QI)	.353	.021	.382	17.100	.000	.701	1.426
课程要求的严格程度 (CR)	.161	.030	.118	5.365	.000	.722	1.385
调整 R^2=0.422							

响学生满意度的最显著因素。学生在学校互动的对象，主要包括任课教师、同学、学生系统工作人员（如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如教务员等）。互动既要有“量”，又要保“质”。互动的质量主要表现在：需要任课教师帮助时能否找到他们并得到良好的帮助、与其他同学之间是否友好和相互支持、是否能够得到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和理解。如正式生师互动与非正式生师互动，其对学生教育满意度的影响比对教育总体收获的影响更大，说明教师与学生的交流状况是学生评价其所在院校或专业的重要考量指标。已有研究证明，生师互动可以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排名及学生个体社会性能力发展产生正向作用。生生互动在校园环境中非常频繁，其质量也影响着学生的教育满意度。可见，师生教学相长、行政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良好的宿舍文化和人际关系、丰富的校园文化，在这种环境中良性互动，能够提高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增强学生在社会交往中的自信，有助于良好校园风气的形成，学生越满意，校园越和谐。

（二）向学/厌学（SWL）

向学 / 厌学 (B=0.188，p=0.000<0.001), 在所有因子中，B 值仅次于互动质量，能显著预测学生的教育满意度。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本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影响其学业成绩，进而影响对教育质量的满意度。“向学 / 厌学”主要表现在学生的学习动力强弱程度、遇到学习困难是否想尽办法克服、是否专心致志学习并心中充满快乐、是否认为学习能使自己不断成长而愿意去学、是否知道所学的意义、是否喜欢自己的专业，是否认为自己所学专业能对未来满意的生活有所帮助。向学的学生满意度高，反之亦然。

（三）有效教学实践（ETP）

有效教学实践（ETP）（B=0.168，p=0.000<0.001）也可以显著预测学生的总体满意度。在教学实践中，任课教师教学行为的有效性十分影响学生的教育满意度。“有效教学实践”主要表现在教师是否能清晰解释课程目标与课程要求、是否能合理安排教学进度、是否在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一定的学习自主度、是否会选择使用案例或图示来解释教学中的难点、是否会在学生作业过程中给予指导、以及是否及时反馈考试及作业情况。有效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一直是大学格外关注的问题。有研究表明，有效教学的主要特征包括：教学清楚明了（明确教学目的、重点和难点等）、充分地准备和科学而合理地组织教学（课堂节奏、教学进度、重点难点讲解、师生互动）、在教学中关注学生并与学生合作（尊重学生、鼓励参与、给予自由、适当反馈）、教学促进学生进一步发展并富有教学热情。每一位大学教师都应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和提高其有效性，以确保教学质量。

（四）课程要求的严格程度（CR）

课程要求的严格程度（CR）（B=0.161，p=0.000<0.001）亦显著影响学生对学校的教育满意度。课程要求的严格程度主要体现在任课教师要求学生为完成本门课程或达到本门课程的教育目标所需要进行的学术阅读、写作和对考试环节的要求。对于“课程的考核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激发你更好地学习？”题项，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考试（Mean=64.31）、个人独立完成的课程作业（Mean=64.02）、小组合作完成课程作业（Mean=61.91）、实验报告（Mean=52.06）、论文（Mean=50.13），可见课程考核越严格，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课程论文 / 报告的要求方面，得分依次为；广泛搜集和查阅资料（Mean=65.32）、提出自己的观点或想法并进行论证（Mean=63.29）、深入印证大量相关文献和数据（Mean=56.99）、和老师 / 同学反复讨论（Mean=50.39）。课程难度大、要求高，学生则需要“努力学习以达到课程的要求”，教育收获就越高。当然，从得分也能看出，老师对课程论文撰写过程中的“反复讨论”要求不高，也说明“生师互动和生生互动”在

课程学习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五）支持性环境（SE）

支持性环境（SE）（B=0.073，p=0.001<0.05）也能显著预测学生教育满意度。支持性环境主要指学校为学生学习生活等提供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学校是否为学生的学业提供支持和帮助（如学业指导、写作中心），是否为学生的身心健康提供支持与服务（如医疗保健、心理咨询等）、是否鼓励来自不同城乡、民族、家庭背景的学生相互接触、是否为学生提供社交机会，学校是否鼓励学生参加各类校园文体活动（如艺术表演、运动竞赛等），是否鼓励学生参与跟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相关的活动。高等教育是高资源依赖型组织，提高大学教育质量需要必要的资源支持。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显示，校园环境支持度与学生的收获和满意度直接相关。支持性越强，满意度则越高。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烟台大学学生满意度高于全国同类院校平均水平

在维度“整体就读经历、学术经历、社交经历、学习硬件条件、学习风气和氛围、课程质量、教师教学水平、二次选择专业机会、求职就业指导、整体收获成长、向他人推荐该校”中，烟台大学学生最满意的是“教师教学水平”，其次是“整体收获成长、向他人推荐该校”。对于一所高校，人才培养是其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功能，教师的教学水平自然更是重中之重。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的认可，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该校教师在教学上投入的功夫大，重视学生的切身感受，注重师生互动和学生的实践参与。学生毕业的时候，更愿意“将学校推荐给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学校的声誉，因为来自“顾客”的直接推荐最能打动人。通过与全国同类院校常模比较，满意度的各个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该校注重教育服务质量，“软硬兼施”，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既保证学生学习生活的硬件条件，也注重校园文化的建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学生不仅仅是从课堂教学、还包括学校的各种“隐性课程”中获取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积极的力量。

（二）烟台大学学生满意度的性别差异不明显，学科差异、年级差异显著

首先，在性别上，研究发现男生和女生在总体上满意度无明显差异，但男生在“学习风气和氛围”、“课程质量”、“教师教学水平”三维度明显逊色于女生。因此要加强男生中的学习风气，杜绝不良习惯（如网瘾）影响他人的学习和感受。其次，在学科方面，法学学科学生满意度最高。这与烟台大学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该校的法学学科最早由北大法学院支援建设，多年来传承了优良的文化，该学科在本省学科专业中名列前茅，“民商法”在国内也有较高的名气；另外，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科研水平强，本科、研究生的教育培养等方面每年吸引了大批的学生报考，录取分数居高不下，即使“初次就业率”不高，也不影响学生的满意度。但是，烟台大学有 57 个专业，工科专业接近一半，在“课程质量和教师教学水平”两个维度上，工科的学生满意度显著低于法学学科的学生。因此，对于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烟台大学，要探究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实践教学条件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需进一步整合和优化课程体系结构和课程内容，加强不同课程之间的融合；需引进高层次人才，提高在职教师的整体素养，培养双师型教师；需深入思考和加强实验室、工程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问题，深化工程实践教学改革，构建贴近产业实际的工程实训平台，加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最后，在年级方面，因为一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历来受到重视，满意度较高，而中间层的二年级和三年级也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要采取措施，让“二年级现象”防患于未然。

（三）“互动质量、向学/厌学、有效教学实践、课程要求的严格程度、支持性环境”是影响地方本科院校学生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正如 Astin 所强调的：考虑到学生在上大学时所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们对于其大学经历的评价与感知应该被重视起来，学校理应为提升学生满意度而努力。

第一，制度层面，深化职称评定和教学评价模式改革，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投入程度。高校基本都要从教学、科研和服务这三项来考核教师，尤其是职称评定，则更是以科研成果为主要依据。因此，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大学教师自愿或者不自愿地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忙于科学研究以及申报课题、填写报表、报销经费等事务性工作，挤占了用于教学工作、教育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学校对教学设备与经费投入也不如对科研的投入，对提高教学的鼓励远不如对科研成果奖励的力度”。如何提高教师对教学的重视程度？如何引导教师加大教学的投入？这些单靠教师的热情是不够的，必须以制度作为保障。很显然，科学的职称评定制度和教学评价模式是影响教师教学投入的“指挥棒”。现在，部分省份已经将职称评定权交给了高校，高校需借鉴他校先进的经验和改革措施，探索适合本校的聘任制度。人事制度改革的趋势是，建立教师分类基础上的聘用制度和相应的评价机制，完善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分配方式和激励机制。如教师可分为三类：教学型、教研型和科研型。这样，热衷于教学的教师，可以不用有太大的科研压力，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教学研究中去，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教师层面，提高教师教学学术能力，重构适应现代大学组织的新型教师群体。教学学术能力是大学教师从事教学活动、开展教学学术研究应具备的能力。它包括四个维度:“知识维度”指“储备、整合、传授、创新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的能力”，大学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将自己的学科知识与教育知识之间实现互动与结合，并生成“如何教的知识”;“交流维度”包括师生交流与同行交流两部分;“反思维度”是指对教学进行反思、研究及改善行动;“观念维度”是指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当前，最好的理想模式是将教师个人和大学——组织的责任联系在一起，齐心协力来发展教学学术能力。大学教师需改变角色，研究教学方法，在课程中强调并加强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给予学生适当的帮助和指导。院校需通过改进教育教学实践来提高学生的满意度，从而提高学生的忠诚度。

第三，文化层面，创设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为学生发展提供良好支持性环境。文化既是教育之根，也是教育的手段。“办大学就是要办一个氛围”，讲的就是文化的作用。学校文化的品质、品格、品位，随时随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文化又是学校制度实施的重要保障。因此，高校要积淀文化底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生发展创设各种支持性环境。既要重视校园硬件建设，也要强化人文氛围；既要保持学术品格，也要塑造高尚人格；既要优化课程设置，又要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与平台。

总之，高校需从政策上重视和支持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硬件要配套，制度要跟上，教师要敬业，职员要有服务精神，校园文化要有熏陶性；学生要主动和老师等互动交流，积极完成自己的不同难度的课业，选择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积极向学。高校教育质量学生满意度的提高，有赖于院校、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即所谓高校要有“大楼”，又要有“大师”；既要有“奋进”的教师，又要有“向学”的青年。

（注释：烟台大学 CCSS2013 抽样时间为 2013 年 3 月，样本提供部门为教务处，抽样由清华大学协助完成。调查时间为 2013 年 6 月，发展规划处、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共同完成网络问卷的调查工作。数据清理、计分、常模构建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项目组协助完成。可用于烟台大学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完成时间为 2014 年 1 月。论文参考文献略，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中国教育概况

——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2014 年，教育系统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主题，紧抓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两大任务，在“破解”一些人民群众关切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取得新成效，教育内涵发展迈上新台阶，在培养学生成长成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新成绩。

一、教育事业总体进展

（一）教育规模

2014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1.4 万所，比上年减少 5432 所。其中，幼儿园为 21.0 万所，比上年增加 1.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 25.4 万所，比上年减少 1.2 万所；高中阶段学校为 2.6 万所，比上年减少 548 所；高等学校为 2824 所，比上年增加 36 所；特殊教育学校 2000 所，比上年增加 67 所。

2014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为 2.6 亿人，比上年增加 83.1 万人；非学历教育注册人数 5350.3 万人，比上年减少 242.9 万人。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持续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出现回升，而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规模持续下降。

（二）各级教育普及水平进一步提高

2014 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70.5%，比上年提高 3 个百分点，提前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 2020 年 70% 的发展目标；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处于高位，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 99.81%，比上年略升 0.1 个百分点；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103.5%，比上年略降 0.6 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86.5%，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目前新增劳动力绝大部分已接受过高中阶段以上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37.5%，比上年提高 3.0 个百分点，提前实现《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 2015 年 37% 的目标。

（三）教师队伍规模继续增加

2014 年，各级各类学校共录用 37.0 万名应届毕业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比上年增加 1.5 万人，增长 4.2%。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达 1514.1 万人，比上年增加 30.4 万人，增长 2.0%。其中，幼儿园专任教师数增长较快。

（四）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

2014 年，各级政府通过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提高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推动各地建立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出台国家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等有力措施，教育保障达到新水平，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拥有校舍建筑面积 总量达 29.9 亿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1.2 亿平方米，增长 4.2%。其中，幼儿园和初中校舍建筑面积增长比较快，增幅分别达 13.9% 和 5.0%。除普通高校外，其他各级各类学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均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中，中等职业学校 和普通高中增量最大，分别增加 1.4 平方米和 1.0 平方米，分别达 16.6 平方米和 18.9 平方米。

2014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为 6577.8 亿元，比上年增加 737.3 亿元，增长 12.6%。其中，小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值增长较快，为 862.9 亿元，增长 20.3%。随着仪器设备投入总量的增加，各级各类学校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均比上年有所提高，其中，中职学校和小学增幅最大，

分别比上年增长24.6%和19.2%，分别达4661元和913元。

二、义务教育（略）

三、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略）

四、高中阶段教育（略）

五、高等教育

2014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稳步发展，结构进一步优化，办学条件保障水平有所提高，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国民素质提升，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

2014年，全国共有普通、成人高等学校2824所，比上年增加36所。其中，普通高校为2529所（含独立学院283所），比上年增加38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202所，比上年增加32所；高职（专科）院校1327所，比上年增加6所。成人高校为295所，比上年减少2所。

2014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62.1万人，比上年增加1万人，增长1.6%。其中，招收博士生7.3万人，硕士生54.9万人；全国共招收普通、成人本科、高职（专科）学生987.0万人，比上年增加30.7万人，增长3.2%。

普通本科、高职（专科）招生721.4万人，比上年增加21.6万人，增长3.1%，增幅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其中，普通本科招生383.4万人，比上年增加2.0万人，增长0.5%；高职（专科）招生338.0万人，比上年增加19.6万人，增长6.2%。成人本专科招生265.6万人，比上年增加9.1万人，增长3.6%。

2014年，全国高职（专科）招生规模有较快增长，普通本科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增幅相对较小。高职（专科）、本科与研究生招生的结构比由上年的41.9:50.1:8.0调整为43.1:48.9:7.9。

（二）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

2014年，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比上年增长2.9%。高等教育普及水平进一步提升，毛入学率达到37.5%，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提前实现《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2015年37%的目标。每十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2488人，比上年增加70人。

2014年，全国在学研究生184.8万人（其中，博士生31.3万人，硕士生153.5万人），比上年增加5.4万人，增长3.0%，增幅比上年的略有回落。

全国普通、成人本科、高职（专科）在校生3200.8万人，比上年增加106.3万人，增长3.4%。其中，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在校生2547.7万人，比上年增加79.6万人，增长3.2%，增幅与上年持平；成人本科、高职（专科）在校生为653.1万人，比上年增加26.7万人，增长4.3%，增幅有所回落。

（三）普通本专科毕业生规模

2014年，全国毕业研究生53.6万人（其中，博士毕业生5.4万人，硕士毕业生48.2万人），比上年增加2.2万人，增长4.3%，增幅有所回落。全国普通本专科毕业生659.4万人，比上年增加20.6万人，增长3.2%，增幅比上年高1.0个百分点。

（四）研究生学位结构

2014年，国家继续积极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稳步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强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了各类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多种需求的有效衔接。

全国高等教育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23.9万，比上年增加1.4万，增长了6.2%，占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的43.5%，比上年提高近2个百分点；招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2015人，比上年增加296人，增长了17.2%，占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的2.8%，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2014年，全国专业学位硕士在校生60.5万人，占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39.4%，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全国专业学位博士在校生为7713人，占博士研究生在校生

总数的2.5%，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五）普通高校教师队伍

由于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增长和加强教学资源配置的投入力度，普通高校的办学条件总体上得到改善。2014年，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数比上年略有增加，为156.6万人，比上年增加3.6万人，增长2.3%。其中，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有153.5万人，比上年增加3.8万人，增长2.5%。普通高校50岁以下中青年教师有128.6万人，占83.8%。普通高校生师比为17.7 ： 1，比上年略增0.2，其中，本科院校为17.7 ： 1，高职（专科）院校为17.6 ： 1。

教师学历层次继续提高。2014年，普通高校研究生学位教师比例为66.5%，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本科院校为76.3%，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高职（专科）院校为42.3%，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比例略有提高。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比例为41.5%，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本科院校为46.4%，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高职（专科）院校为29.4%，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六）普通高校办学条件

全国普通高校校均规模为9995人，比上年增加181人。其中，普通本科院校为14342人，比上年增加81人；普通专科院校为6057人，比上年增加181人。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与上年基本持平。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教学辅助及行政用房面积14.4平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本科院校13.4平方米，与上年持平；高职（专科）院校16.0平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配置水平普遍提高。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为11820元，比上年增长6.5%。其中，普通本科院校为13478元，比上年增长7.5%；高职（专科）院校为7897元，比上年增长2.9%。

信息化水平有所提高。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25.2台，比上年增加0.7台。其中，普通本科院校为25.4台，比上年增加1台；高职（专科）院校为24.8台，与上年基本持平。

普通高校校均上网课程为145.5门，比上年增长18.7%。其中，普通本科院校校均上网课程为245.9门，比上年增长20.3%；高职（专科）院校校均上网课程为54.5门，比上年增长8.9%，数量及增幅明显低于本科院校。

六、成人教育及培训

2014年，全国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736.7万人，当年已毕（结）业920.3万人次；接受各种非学历中等教育的学生4613.7万人，当年已毕（结）业5084.5万人次。

2014年，高等、中等教育培训注册学生中，全国资格证书培训注册学生943.5万人次，比上年下降5.7%；结业学生1051.6万人次，比上年下降4.8%。全国岗位证书培训注册学生1282.1万人次，比上年下降4.8%；结业学生1433.9万人次，比上年下降6.2%。

2014年，全国有成人小学1.8万所，在校生116.4万人，教职工4.0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2万人；成人初中1370所，在校生46.3万人，教职工8732人，其中专任教师7559人。

扫盲教育进一步推进。2014年，全国共有扫盲班1.3万个，毕结业人数44.2万人。

七、民办教育

各级政府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引导民办教育健康发展。除民办中职外，各级民办教育规模均比上年有所增长，所占比例也进一步提高。

2014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5.5万所，比上年增加6252所，增长4.2%；各类在校学生为4301.9万人，比上年增加223.6万人，增长5.5%。

【摘自：教育部网站（2015年11月25日）】

“十二五”山东教育成就回顾（高教）

高等教育招考制度不断完善

高等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初步建立。从2012年开始，我省实行以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为主要形式的分类考试招生制度。春季高考主要为高职学校和部分应用型本科选拔人才。实行“文化知识＋专业技能”考试方式，专业技能考试采取实际操作的方式，主要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2015年，通过春季高考、单独招生等形式录取学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近50%。

考试形式和内容不断优化。改进高考科目设置，自2014年起夏季高考调整为“3+综合”模式。推进夏季高考命题改革，按教育部要求，不断扩大全国试卷使用范围，2015年外语科目使用全国卷，拟于2016年起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科目、2018年起语文和数学科目使用全国卷。

高校招生录取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全省统一划定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进一步减少录取批次，实行平行志愿填报和录取，提高考生报考志愿满足率，促进录取机会公平。春季高考实行技能拔尖人才免考专业知识和技能考试招生办法。

高校招生公平得到切实体现。2014年起实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当地参加高考的政策，当年录取随迁子女8466人。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面向我省52个财政困难县实行定向招生，2015年招生1100人。今年，我省财政困难县及中西部地区和沂蒙革命老区的62个县（市、区）纳入国家重点高校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专项计划。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持续深化

高校分类管理格局基本形成。引导高校科学定位，促进形成类别清晰、特色鲜明的高等教育体系。实施高等教育名校建设工程，积极引导省属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十二五”期间，财政投入6.5亿元，重点建设5所应用基础型、15所应用型高校，打造人才培养特色名校。

学科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编制省属本科高校限制性专业目录和预警专业目录。实施普通本科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支持计划，省财政设专款支持35所普通本科高校59个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优化。在山东大学等23所高校试点学分制改革，实行弹性学制。加强课程资源建设，鼓励校际之间建立教育联盟，开展学分互认、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高校科研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实施高等学校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工程，建设了155个高校重点实验室和50个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投入资金23亿元，实施高校协同创新计划，立项建设23个、培育建设12个“山东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协同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200余家，聚集了包括30位两院院士的一批领军人才，产生了一批创新成果。

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不断优化研究生培养类型结构，分类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省有21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36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达到31个，专业学位培养规模已与学术学位研究生规模大体持平。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目前，全省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达到186所，有65所进入国家示范校创建行列。13所高职院校成为国家示范（骨干）校，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确立以市为主统筹中等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取消普通中专招生计划和就业报到证制度。

教育保障机制更加健全

实施“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支持计划”，确定10所高校的11个学科为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深化实施“高校青年教师成长计划”，资助3600名青年教师到国内、国外高校和科研院所访学研修。

依法治教水平不断提高。2014年，全面启动高校章程建设。公办本科高校已全部完成。

【摘自：山东省教育厅网站（2015年11月16日）】

张大良：鼓励高校在同一层次和同一类型中争创一流

“高校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人才培养与“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互联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有效对接。”今天，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在人民网2015大学校长论坛上致辞时表示。他说，高校将深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高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实现名师、名课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谈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张大良表示，国家将健全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加强分类指导、分类评价、分类管理，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办出特色。在同一个层次和同一种类型当中，争创一流。要建立国家宏观管理、省级整体统筹、高校自主自立的学科专业设置管理机制，主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要鼓励具有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大力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促进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摘自：人民网（2015年11月27日）】

《烟台大学章程》正式核准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下发《山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第9号》，《烟台大学章程》通过核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我校自2012年正式启动《烟台大学章程》修订工作，并专门成立了以崔明德书记和房绍坤校长为组长的章程制定工作领导小组。章程草案在广泛征求广大师生员工意见的基础上，经教职工代表大会、专家及教授和学生代表系列座谈会、校长办公会、党委常委会等会议，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九易其稿，最后经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并经党委全委会审定，于2014年底按照教育厅规定时间上报核准。《章程》核准稿经山东省教育厅组织初审、复评及终审审议，在各次审议意见的基础上对核准稿进行修改完善。近日，经山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委员会核准。

《烟台大学章程》包括序言在内共十部分内容，计94条11000余字。序言，表述学校建校时间、缘起、办学目标、办学理念、大学精神、发展战略及培养目标；第一章总则，载明学校校名、住所地等，宣示特征和属性、基本制度、基本任务及校训；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规定学生和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及学校对学生和教师的基本管理制度；第四章，表述学校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四大任务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第五章，表述学校的领导体制、决策机制、组织结构、二级管理体制与机制、学术组织、民主管理等事关学校运行管理的方方面面；第六章，表述对资产、经费、后勤、校园的管理原则；第七章，外部关系，表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支援烟台大学建设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校友会及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组成原则及运行规则；第八章，学校标识，载明校名标准字体、校徽、校旗、校歌、校庆日；第九章，附则，明确章程修改的启动、审议程序及章程解释权的归属。

大学章程是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前提和基础，是依法治校的重要依据，是推动学校科学发展的基本保障，对学校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烟台大学章程》立足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反映校情基础，凝聚学校共识，体现当代特色，将凝聚广泛共识的办学理念、目标任务、发展战略、民主机制和办学特色落实在学校的根本制度层面。《烟台大学章程》作为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和依据，为推动学校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体制，依法治校、科学发展，实现特色鲜明、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建设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摘自：烟台大学网站（2015年12月11日）】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2015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

11月14日，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2015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高教司副司长张爱龙，以及来自全国的近200名高校代表出席会议。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出席会议并致辞，联盟理事长、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作联盟工作报告。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成立于2013年4月，由林建华（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现任北京大学校长）倡议发起，首批共有29所985及211高校加盟。林建华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当年在重庆大学推动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建设的初衷。西部学校很希望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东部学校提供优质资源的动力何在？他认为一方面是提升东部学校在教学、人才培养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东部学校可以通过建设这些翻转课堂资源，提升自身的教育质量。而老师的动力是显而易见的：将来的名师需要有好的慕课。林建华指出，现代信息技术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为师生提供了远程互动的可能，但要解决西部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需要提供经过严格管理后能够认定学分的课程。如果只是提供上网看的视频，就和过去电视大学的课程没什么两样了，因此必须提供互动的课程，这正是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与edX、Coursera以及国内其它平台最大的区别。

高松在会议上公布了一组数据，经过两年半的发展，联盟成员已经增加到93家，包括近30所985高校和近70所211高校，这些学校在联盟运营商智慧树网所提供的专业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累计开设了联盟委托运营课程近200门，全国受益学校超过1000所，覆盖大学生人群1000万，已有近50万学生通过联盟课程获得了学分，累计有超过100万大学生修读了学分课程。这些课程被称为“中国式慕课”的典范。

林蕙青在总结讲话中代表教育部，向为此作出贡献的北京大学、各联盟成员学校的领导老师们，以及平台建设的运营单位——智慧树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她指出，联盟中高水平大学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东西部高校优质资源共享、实现教育公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体现了这些高校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东西部高校直面挑战，支持和鼓励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新手段，参与和创造性地应用优质资源提升教学水平，在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智慧树网发挥了技术平台支持、课程建设服务、教学运营服务等重要的作用。经过两年的发展，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已经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东部高校支援西部高校的概念，而且是东中西部高校之间共享优质资源、共同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教改之路，分享改革成果，是一个共建、共享、共赢的联盟。联盟的协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值得肯定，并且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她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领导对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育目标，积极开展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着力推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她对联盟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期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改革深度融合是十三五期间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希望联盟和高校继续努力，积极组织协调、动员更多学校更多教师参与到这项富有时代意义的改革中来，研发出更多高品质的课程，引导和示范在线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

【摘自：北京大学新闻网（2015年11月17日）】

高 教 信 息

（季 刊）

主管单位： 烟台大学
主办单位： 发展规划处
编　　辑： 高教研究室
地　　址： 山东　烟台　264005
联系电话： 0535－6902347
电子信箱： ytugjyjs@163.com
网　　址： http://fzgh.ytu.edu.cn/gjyj
主　　编： 郝曙光
副 主 编： 刘丽娜　孙　英
封面设计： 王　磊
印　　刷： 烟台大学印刷厂

DIGEST OF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Director: Yantai University
Sponsor: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Editor: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Address: Yanta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Postcode: 264005
Telephone: 0535－6902347
E-mail: ytugjyjs@163.com
Website: http://fzgh.ytu.edu.cn/gjyj
Chief Editor: HAO Shu-guang
Vice Chief Editor: LIU Li-na SUN Ying
Cover Designing: WANG Lei
Printer: Printing House of Yantai University

烟台大学 YANTAI UNIVERSITY